KU CAI

苦菜

戴平万



海峡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戴平万（1903—1945），广东潮安县人，1926年毕业于国立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西语系。青年时代即已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被党派往暹罗工作，曾参加过海陆丰农民运动。1928年起，在上海从事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运动，是“左联”成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中篇小说《前夜》和《荔清》。“九·一八”事变后，被党派往东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后回上海，创作了不少反映东北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出版有译作《求真者》和理论著作《俄罗斯的文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留在上海“孤岛”坚持斗争，是“孤岛”文学界党的负责人之一，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苦菜》。1940年冬，到苏北根据地，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1945年初逝世。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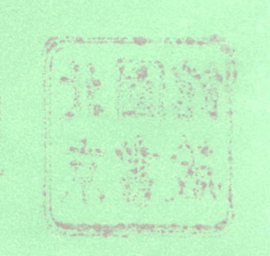
《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

名譽主編：巴　金

主　　編：樓適夷　林淡秋　柯　靈　朱　雯

編　　輯：楊幼生　陳夢熊　管　權　胡凌芝　蕭斌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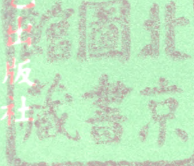


苦菜

戴平万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05号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苦　菜
戴　平　方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4.125印张　4插页　82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80534—075—7
I·69　　定价：2.05元



戴平万摄于上海“孤岛”时期



戴平万摄于大革命时期

戴平万摄于“左联”时期



苦菜初版封面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缘　起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

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发表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

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朱雯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①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

① 1985年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目　录

苦 菜

苦菜不算上等的蔬菜，无论哪一家的菜园都不会种它，只在树林里的矮棘丛中自己偷生着。有刺；味苦而带甘。可是拿来当菜下饭，总比吃树皮树根好得多。饥荒的年头，它就变贵重了。但现在是丰年，人家还是抢着采。

这照李老太太的说法：是人们一代代地变下流，口味都改低，并不是苦菜知道，人家需要它，会自家成了美味。李老太太是屯里人，又活在贫穷家，下饭的菜，除了大葱，辣椒，咸萝卜，就是苦菜。苦菜用不着钱买，只花了半天工夫到树林里去，就可采得满满的一篮。时常采，时常吃，苦味变成甘味。而李老太太的吃苦菜，也变成了嗜好。小孙子不吃，给她骂，媳妇儿少吃，也给她骂，骂他们不识人生的甘苦。

虽说是丰年，而李家只有小小的一片地，就是种下去的大豆比往年多收三两倍，也不济事。何况城里大豆无价，简直没人想买。在大连那儿，正一包包地往海里沉，说是要救救市面。

“可不是救不了，照旧不值钱！”儿子报告了从城里听来的消息，叹了一口气。同时，李老太太狠狠地骂道：

“那天杀的鬼子呀！……”

但是她没有往下骂。因为骂人也要有闲，而李老太太正忙着出去采苦菜。她提了篮子，匆匆出门，连头也不回地，好象怕瞧见她儿子的苦脸。

近便的小树林里，别想采，怕连根也给人家掘去了。李老太太只得穿过一片荒原，走到那座大松林里去。占了十几垧地的松林，远远地望起来，象一匹伏在荒原上的野兽，张大着口，想吞前面的村庄。村庄是荒凉，没有人烟，已给炮火烧毁了的。而松林可十分苍翠，繁茂，在太阳光里乐天地摇着头，长啸。

这并非陌生的地方，李老太太往日也尝来过，尤其是儿时，差不多每天来的。她时常在松林里采野花，捉蝈蝈儿，有时，也陪着长辈们到林里采苦菜。那一处的苦菜多，那一处少，现在她还记得很清楚呢。

一点也不错，在那儿棵合抱的大松树旁边的矮棘林里，依旧是苦菜最多的地方。青青的苦菜，多嫩，多新鲜！她自己笑了。

她边采边想：“多好的苦菜，谁也不上这儿来摘，太可惜！”可是她又想：“原是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啊。他们又懒又胆小，怎会来呢？象我这一辈子的，死的死，逃的逃，还有几个能来？原是的，怪不得的。”

她可没有想到人家怕危险，不敢来。她好象忘记了这松林里时常有狄兵和义勇军打战的事。

真的，苦菜的嫩绿，使她忘记了一切。但是，苦菜的嫩

绿，唤醒了她的童年。童年虽然穷苦，但过着太平的日子，太平得象眼前的景物。——

这松林是崇高，空阔，温和，飘渺，真象个梦境！记忆里的狗尾草，还不是胡须白蓬蓬地依然在绿草间点头吗？可爱的野藤，还不是涨紫着脸，象在生谁的气吗？那玲珑的小野花，还是做女孩子时插在鬓上的一样娇媚可疼的。松枝上的日影儿，正象孩子们在捉迷藏，追着躲着，一不小心，便跌落在草地上，又在追逐藏躲着。啊！一切都是童年时的活泼有趣的景色啊！她可因为家累，整整有二十多年不曾到这松林里来了！要是变小了几十年，怕不会脱了袜子在草地上瞎跳一阵么？可惜现在老了，空有那样的心。……

她胡思乱想着，活泼地俯下身子，避过那迎面打来的山树枝，又继续地摘苦菜。她往篮里瞧了瞧，把手探了探，已经实实地半篮多了。那些先采下来的苦菜，叶儿有点憔悴，怪可怜的。于是她象安慰小孩儿似地说：

"别伤心呀！回家才有凉水喝呢！"

说着，她自已慈爱地笑了，好得意地走进树林的深处。树林深处的苦菜更多，路也愈不易走。但是，这有甚么关系呢？前进吧，前面有多好多嫩的苦菜啊！

两只蝈蝈儿，突然从乱草中飞了起来，飞绕在她的身前身后，闪着白色的纱翅。她用迟笨的手，忙乱地扑着，可是捉不到。同时，蝈蝈儿已远远地飞进乱草中去了。于是她恼了，在呢喃着，说蝈蝈儿不用想出许多花样来逗她，要是她的孙儿跟了来，绝不饶它们那样的自由自在。

更可恼的是，她带来的篮儿太小，小得装不下这满林的苦菜。现在，篮儿是满满的，手里也是满满的，连抹开横枝认路的闲空也没有。她只小心着她的苦菜，不饶一棵留在荒林里。

同时，她的心，正在得意地打算今晚的晚餐：——

今夜晚，这许多的苦菜，都把来下锅吧。许多日子没有好好地吃一顿了。今晚儿，一定叫富生（她的儿子）买点香油皮，再买一些上等的辣酱和半斤白面，象有钱人家的吃法。要是周长柜不肯挂账，那我得自家去，去问问他可是忘了从前我们家的好处？我们家也是富有过来的。那时候，可不是饶人家借的借，乞的乞，现在又往那里讨去？虽然一年不如一年，好快地穷下来，要不是鬼子来了的这年头，大豆卖不得钱，甚么时候欠过人家一文账？现在叫做没有法，生活可真不好过。老天爷偏又放下这许多的大豆。下得太多啦！这是时运啊！……富生瞧着可没有大来头，只靠老天爷吃饭。要过好日子，只望小孙儿。小孙儿可疼，今夜晚多把些苦菜他吃，别饶他整天馋嘴馋舌的……

突然地，从树林密处传来了一阵号声，那是象人的，又象兽的号声。这声音，惊醒了李老太太的晚餐的迷梦。她吃惊着，笨重地快跑起来。正象一架半坏的运货车，装了太多的货物，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走过。

那号声越来越近。接着，在松树下，在矮棘丛旁边，出现了两个狄军的步哨。他们在号着，然而不知道他们说甚么。李老太太一面请菩萨保佑，一面还想藏躲，可是来不及

了。步哨已经走到她面前了。

“爷爷饶命，我是摘苦菜的，我并不敢为非作歪，我是摘……摘……摘苦菜的，我是……”李老太太声辩着，一面掩藏着篮子，好象怕他们抢她的。

步哨哈哈地笑了。他们俩咕噜一下。那较矮的一个板着脸孔，呼喝了两声，又做手势。

可是李老太太不懂，也没有方法理解他的手势。她吓得连理解力都给她的菩萨带走了，同时她嘴里依然在呢喃着菩萨。

那高的哨兵又哈哈地笑起来了。

那矮的抢上一步，伸手抢住李老太太的篮子。苦菜都给翻了满地。看看里面，甚么都没有，他发狠地把竹篮掉到远远的松林里去。

这时候，李老太太才大声地哭喊起来。这苦菜是她的命！辛苦了半天采下来的苦菜都给丢了！真是“天杀的鬼子”啊！

“天杀的鬼子！马特皮的鬼子！……”她愈骂愈生气，把满手的苦菜摔在那矮的哨兵的脸上。

但步哨猛力的一拳，把她揍倒。……

正闹着，又走来了好几个狄兵，把李老太太围住。他们瞧着，笑着，效着她的声音咒骂着。又自己咕噜了一阵，好象在商量怎样处置这老太太的方法。

“侦探，你是么？”一个年轻的狄兵用中国话问。

不幸得很，李老太太只懂得探子，不懂甚么侦探，况且

狄兵又把"侦探"念作"真叹"。她真的不明白，只是连哭带骂地闹着。

"不懂，你假的！"

狄兵又大伙地笑起来，好象在赞美那年轻的步哨说中国话说得不坏，连他们都听懂。

但年轻的好象很生气，和那个高个子动手扯开李老太太的上衣。她反抗，但是没有用。他们人多，力又大，不一刻完全给剥光了。

在荒林里，在高大的松树中间，陈列着一个裸露的五十多岁的女人的肉体，越现得可怕，令人不忍卒睹！这简直是兽性！野兽捉到了捕获物，就是这样缓缓地把来玩弄死的！

可是哨兵们，尤其是那年轻的，居然还在打开自己的裤子。于是他们笑声，骂声，争吵声，和李老太太的哭声相混杂着。同时，松树林回答着一声长长的怒啸。

那年轻的给一个象排长模样的捉住，枪口对着他，迫他穿上裤子；又命令他和其他的两个，一同捉了李老太太，走去缚在远远的一颗松树上。那排长自己，拿起了手枪，瞄准着。这一刻，林里突然静寂起来。没有风声，没有树语，没有鸟叫，也没有人说一句话。

一瞬间的可怕的静默。——这静默象是默哀，哀悼着那一个赤裸裸的，缚在树干上的，无辜的被牺牲者。

轰然一声，手枪的子弹无情地飞了出去。接着就是李老太太的一个惨痛的叹气。接着是狄兵们的欢呼。接着就是松

树的怒啸。接着就是被惊飞在天空的老鹰的凄啼。

接着又是一阵静寂。

撒了满地的苦菜缓缓地憔悴，枯萎，缓缓地枯萎得象干草了。可是再也听不见李老太太慈爱的声音：

“别伤心呀！回家才有凉水喝呢！”

病

清早起来，他觉得头很沉重，象里面灌满了水银。他担忧地自语道：

“糟糕，我闹病了！”

闹病应该休养，可是他不能，铁工场不准告病假。

“不是罢，那里是病呢，”他又自慰着，“都是昨夜晚的梦，把人弄失神了。”

昨夜晚，他做了个梦，梦见不认识的一个漂亮娘儿，和他睡在一起，怪甜蜜的，醒时没有的甜蜜。他还没有媳妇，虽然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他闷闷地，不想吃早饭。把工衣往身上一套，就上班去。

干活的铁工场在日站，而他却住在小姑屯，这中间隔着十几里地。早上六点半就要进工场。迟到了，扣工钱。他不得不起个绝早。

早晨的路上，没有别样人，尽是赶着上班的劳动者。不过，他太早了，难得碰见个熟人。他的熟人，大半是在“大厂”干活，而“大厂”，就在小姑屯的近旁，又是七点钟才开车，这时候，人家还躺在炕上呢。然而，他终于碰到

了：

"早啊，老徐。"

"早啊，小李。"迎面走来的老徐站住了。"怎么老没瞧见你，这一向可好？"

"好的。"

"这么早，上哪儿去？"

"上日站，我在日站的铁工厂干活了。你呢，不是上班罢，这么早？"

"别提上班，提起来真讨气！"

"怎么的？"

"我昨天给撵了！"

撵了？这可真了不得！倒底怎么啦，"大厂"一收归"满铁"，甚么都变了，老是撵人。撵了小李自己，撵了小李的许多朋友，现在又撵老徐，"大厂"可真变了……

"那末，你怎办？"

"没办法啊……"停了一下："再见罢，别让你误点了，再见。"

"再见，再见。"

夏天的太阳起来得真早，把电灯杆长长地倒映在大路上。小李怕迟到，急赶着走。而列车从"总站"驶来，哗啦哗啦地阻住他，不让他过三弓桥。

倒霉！真倒霉！这可不迟了！迟了！他站住，在干着急。

他真的迟到了，可是头儿没发觉。

像偷儿，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车位去，开始他的活。

今天的活，尽是些小螺丝钉，干起来很费神。他只得打起精神，细心地干。

干着，干着，耳朵里涨满了皮带声，发动机声，切铁的吆吆声。

头很沉重，怪痛的。

可是他还是干，干，吃劲地干，干得又快，又熟练。

“好小李，真不错！”

头儿夸奖他。他得意。他想做得更好。可是——

啊？太险了！一不小心，他的指头差些戮在切铁刀上，那轮轴上飞转的发光的切铁刀！

可真昏了脑袋吗？……他骂他自己。

可是，手里的螺丝钉变活了，变成一条毛毛虫。接着，变成二条，三条，变得模糊了，瞧不清了。

瞧不清了。机器，连人，连屋子，连他自己，都瞧不了……他昏倒了！

醒转来，他才知道自己斜倚在事务处的靠背椅上。鼻子里满是亚莫尼亚的臭味。他作呕。

“小李，怎么样，好些吗？”事务员问。

他定了定神：“我怎么啦？”

“哈哈！不知道么？你闹病，中暑了。”事务员带笑说。

事务处的门开了。头儿走进来：

“醒了！醒了！还干活不？”

很想干，倒是他的病体不让他再干。

事务员帮着他，叫了部马车，拉他回家去。

热毒的太阳光，又强又硬，隔着车盖，还刺得人怪痛，马车马的铁蹄，踢起路上的灰尘，同着一阵阵的热气没命地往车门里扑，好难受的。

怎么老不到家呢？他厌烦了。而他的头老是痛。

好了！那不是小姑屯大街吗？小姑屯车站对过的那家生果店，桌子摆到大街上，一边放了一只大冰糕桶。一个店伙站在桶边，使劲地摇，一面喊：

“冰糕，冰糕，新鲜的冰糕！”

他的马车打前面经过，那店伙喊得更响。

“傻家伙！”他也觉得好笑。可是头痛得利害……可是还没到家……

他想睡，合上眼。

不知不觉地，可就到了家了。

他把仅有的四毛钱给了车夫，便将身子掉在炕上。

火红的脸，灰白的嘴唇，失了光采的眼睛，没有气力的四肢。这些都不是他原来的。他唉唉唉地躺在炕上——就这样，真的病倒了。

隔邻的好心的周老太，知道他闹病，跑了过来：

“怎么啦，李哥儿？早上出去，好好的，怎么就闹病？”

小李不是医生，没有进过学校，也不知道怎么好好的人会闹病。

而周老太还是：“怎么好好的就闹病？好好的怎么就闹

病？怎么……？”

小李想敷衍她，可是，觉得路上的灰尘和热气，好像一齐往他头上冒，很不好过。他唉唉着，越唉越利害，又昏了过去。

*

他觉得额上难堪的疼痛，象火烧，想扑灭，可是他的手给捉住了。他听到：

“醒了，醒了，”是周老太的惊喜的声音。

“醒了！”是另一个老娘儿的回响。

他睁开眼——原来是巫医婆赵大娘。

巫医婆这花名，是屯里小学校的韩先生送给赵大娘的。小李从别人口里听到了，觉得这花名很有趣，就跟着叫。

这下子，他明白了。他知道他的前额上，贴着三个小瓦罐儿。两个像大姆指般大，另一个，还要大些。那大的安置在前额的正当中。两个小的，一个在左额角，一个在右额角。那些小罐，里面烧得滚热的，给倒置着伏在他的额上，罐口把额皮吸得紧紧地，痛得像火烙。

他完全明白了。那是周老太请来了赵大娘，救醒了他的。赵大娘会符咒，而近年来符咒不大灵了，她又替人家诊诊病。

真是名符其实的“巫医婆！”……小李想。他觉得韩先生真聪明，“巫医婆”这名字真有趣，自己失笑了。

韩先生说：赵大娘的医病“全是原始的治疗法”，很危险，要不得的。小李觉得这话对。可是没有钱，那里能够请

洋医，进医院养病呢？他不得不相信赵大娘的“原始治疗法”。……

总之，无论如何，只这“巫医婆”三个字怪好玩，他又不觉失笑了。

“怎么笑？觉得好过？是吗？不是吗？”

周老太老是要问人家，问得人家无法对答。他怎能觉得好过呢？他的头痛，腰痛，腿痛，全身都痛！还有前额那安置了三个小瓦罐儿的前额，更痛得发麻！

“赵大娘，赵大娘！”他叫。

“怎的？”

“这头上的东西……”

“头上的东西？”

“这小罐儿，额上的，能不能拿掉？”

“不！等它热气退，自然跌下来的。”

“可是痛啊！”

刚说着，他的身子一动，左额角的一只跌下来了。

啊！轻松得多了！他觉得。

接着那两只也跌下来了。

啊！真轻松得多啊！……可是不轻松的事情又来了！

“来，周老太，你帮我。还有你，”赵大娘转向小李，“李哥儿，你自己把裤管卷起来，卷到膝盖上面。”

小李不知道干甚么，只听从她的嘱咐。

“李哥儿，你伏着，别动！”她又对周老太：“老太，你握住那大腿，要握得紧！两支手合起来，瞧，这样握，才

有劲！”

这样握，在小李的腿弯处，露出了青青的大血管，在跳动。

而巫医婆赵大娘，对着血管，用指头画了画，象是用魔法来麻醉病人的神经。她画了一会，又从那宽大的袖子里，拿出一根小竹管，管里抽出一根长针儿，又粗又长，使小李不禁忆起儿时在村里习见的穿牛鼻的铁针儿。

“干吗？”他失惊了。

“放血。”赵大娘说。

“放血是这样放的吗？”小李怀疑了。

“当然是的！”她不高兴地：“放不放由你，你说不，便拉倒，病的是你自己啊！”

“怎么不？要放的！”周老太又问小李：“你这么大了，还没有瞧过人家放血吗？”

“没有啊！”

“你放心罢，不危险的，谁昏了谁要放，等灵验。”

不错，这种“原始的治疗法”，在这屯里是很流行的，而且是没钱人的唯一治病的方法，每当暑天，街上很容易瞧到人们的额上，有三个圆圆的赤褐色的烙印，象小李那样的，那大都是赵大娘的功绩。

“不致全坏罢，大家都信她的。”想着，小李不说话了。

“赵大娘，你放罢，放罢，他年轻不懂事。”周老太在恳求着。

巫医婆赵大娘点点头，又命令周老太按住小李的腿儿：

“使劲儿，别乱动！”

跟着这警告，赵大娘用那根大铁针，刺进血管里，刺有寸来深，像一个医学博士打药针的样儿。跟着鲜血像泉水般喷了出来。

可是小李疼痛得心都碎了，眼泪直流，又昏了过去。

“这才好，人发昏，是因为血太多了。”赵大娘还在向周老太解释。

在将针第二条腿的时候，小李甦醒了，在挣扎。

“别再针了！别再针了！让我病死好了！我不要放血啊！”他又嚷道：“痛啊！痛啊！我不要放血啊！”

当夜里，小李的病变沉重了。

那是在夜晚十一点多钟。小李在梦中觉得冷，冷得在发抖。

“冷……啊！冷……啊！”

但是屋里只睡他一个人，谁也没有听到这凄楚的颤声。

“冷……啊！冷……啊！”

屋外的月亮，好像受了感动，从纸窗隙钻进来，投射下慈和的光波，想抚慰他。

“我真冷啊！”他清醒了些，又在抖着声音喊。

仍是没有人听到。

他没有爹妈，没有媳妇，没有同住的友伴。

他颤着身体，爬了起来，糊里糊涂地摸到一条棉被，急盖上，卷得紧紧地，可是还觉得冷。而他再没有力气挣扎着

起来了。

冷！冷！像在雪地里般冷！他尽打颤着。

可是不一会，他又在被窝里喊热了。

就是这样，一会冷一会热，自闹了一整夜。

屋外的夜是热闹的。有水银般的月光，音乐般的虫语，软的风，惰的狗吠，沾了露珠的菜圃和树林，熟睡的低矮的院落，耸立在夜空里的“大厂”的烟囱，黑黝黝地像一根鞭苔人类生活的大鞭子——外面的夜实在是热闹的，动人的。可是这动人的六月之夜，更衬出屋里的小李的凄清。他不禁哭泣了。

冷一会，热一会，又哭了一会。即使这一下子小李真的死了，也不会有人来理他呢！

病把他变成脆弱，多感。

病使他忆起失踪的父亲，想起了跟别人走的母亲。这时候，要是有个亲人，他该怎样舒服啊！

但是，没有，自从做了小学徒以后就没有了。他的童年是在铁锤和师父的拳头下度过的。他从学徒，而工人，而现在，已算是个技术很好的青年劳动者。他懂得生活，他从不示弱于压迫他的一切。可是现在，他变脆弱了，他给寒热病虐待得流泪了。

就这样，他哭了一会，又热了一会，冷了一会，直闹到鸡叫。

铁工场的同伴老陈和老薛顺便走来瞧他的病。

“啊，小李，病好了罢？”老薛说。

“不——不能好啊！”小李带颤地说。“昨夜里，闹了整夜寒热。”

“寒热症？”老陈问。

“可不是！”

“噫，病了一天，就瘦得这样儿！”老薛伤感地说。

“这寒热症利害，我知道。我闹过一趟，后来吃了金鸡纳才好。”这是老陈的经验谈。

“那末，小李，你也买金鸡纳吃。”老薛提出他的意见。

可是，在这小村镇上，一瓶金鸡纳要二块钱。小李没有钱，老陈老薛也一样的没有。于是，这正确的提议便在大家束手无策的静默中搁置了。

在谈话中，他们得到另一个结论：那就是小李应该找个代工，然后才能保得住他的位置。

“好的。”小李同意了。“请你们顺便告诉老徐代工去。你们认得老徐？他住在西边那条街的。”

老薛说他认得，还是他的老乡呢。

“不过，小李，你这病必要金鸡纳。真的，别忘了金鸡纳，小李！”临走，老陈这样叮咛着。

*

金鸡纳，这病必需金鸡纳，可是金鸡纳每瓶要二块钱，而小李没有钱，这怎么好？

想着想着，他又遍身滚热起来了。

过了一会，他又是：金鸡纳，金鸡纳，这病必需金鸡纳……

想着金鸡纳，他注意到他的簇新的工衣那是铁工场发给他穿的。他想当了它，但是没有人帮他当。

而寒冷又袭击着他了。

直至将近中午，他还在想买金鸡纳。

恰巧周老太进来：

“李哥儿，今天怎样？好些？不好？”

“多谢你，周老太，”小李说。“我想劳你一件事。”

“甚么事？”

“劳你当件衣服。”他指着挂在壁上的工衣。

“怎么你也当衣服？”

“想买药，没有钱。”

“可是想还赵大娘的药钱？那倒别急。我告诉她等你病好了再还。不一样吗？”

“不是那个，我还想买点别的东西。”

周老太想了想：“那你要多少？”

“二块，多点更好。”

“傻孩子，那衣服能当这么多吗？”周老太笑了，又接道：“要是想钱用，我替你借些，你可要不要？”

“要的，要的，只怕没办法。”

“瞧罢。”

周老太去了许久，和赵大娘一同回来。

啊，又是那个巫医婆！这趟小李不觉得那花名好玩，倒

有点怕她了。他怕她又会从袖子里拿出那穿牛鼻般的铁针儿。

但是不，赵大娘只问：

“李哥儿想借钱？”

“对了，”小李答。“我病了，工钱不能预支，一个子儿零用都没有。”他不敢说到金鸡纳。

赵大娘听了，用精细的眼光，考察着小李，有意沉默了一会，才道：

“那行。不过要说明白。”

“那自然，应当给利息的。”

而赵大娘微笑，好像笑小李不懂借钱的规矩。

“照理，”她说。“借钱应该有保人。不过，我瞧你还老实，又是怪可怜的，一个小伙子在外边，没有个亲眷，又正闹病，太苦了，我算是做点善事，借给你罢。”

“是，谢谢大娘！”小李不禁感激她。

“那末，我们要说明白。想借，必要立个字，写明白借多少，利息多少……”

“别说，这个我知道。”

“好的。那末想借多少呢？”

“二块，多点更好。”

“二块，不够罢，饶我替你算算罢：买药的，请医生的，还要除去利息，养病也要买些好吃的东西，还要……还要买些……没了罢，就是这样，也得十块八块。我想，借给你十块罢，横竖病好了，你怕不能还吗？”

十块就十块，多了可多买些金鸡纳。小李想着，答应她。

周老太瞧瞧没有自己的份儿，赵大娘也不请她当保人，一气恼，只说家里有事，走了。

“就是这样，”赵大娘说，“我回家带钱来给你，你好好养病吧。”一面说，一面摆摆小脚儿，又转回来：“到底你的病怎样，可好些？”

小李告诉她昨夜晚痛苦的情况。

“讨厌，讨厌！”她皱皱眉说，往屋里走了两步，像要诊病，可是又停住：“这下子我且不诊你，回头再细细地诊罢。”说着，撇开小脚儿，屁股左一摆右一摆地出去了。

过一会，正当小李又在发寒热的时候，她来了，后面跟着个男人。那人矮矮的，穿着一套不三不四的洋服，没有领，也没系领带，象个习见的小工头。

“李哥儿，李哥儿，我来了。”

“来了，很好。”小李颤声说：“我，我冷啊！”

赵大娘替他盖上两条被，一面说：

“他是我找来作证人的。他是外国人，做人很好，也和气。”

外国人笑了笑，打着不自然的中国语：

“可好些？不利害罢？”

“利……害啊！”小李望了他一眼，在被窝里打颤。

而赵大娘好象忘记了小李在闹病，只抢着说：

“这是借据，要你画押的。这是借的钱，一共六块。”

“不是十块吗？”小李带颤地问。

“是借十块。里头除去利息和诊金。借一个月，每月每元利息两毛大洋，十元两块，诊金一块五毛，还有五毛钱，算给写字据和作证人的谢礼，一共除了四块。你画个押就数数这钱，一共六块。”

“等一等罢，我冷得发抖，怎能画押？”

“这不难，我叫这位大哥帮你。”

说着，赵大娘擎着个墨盒，走到小李面前，又招呼那外国人：

“来，大哥，你来帮帮忙。”

“别画罢，我太苦了。”小李恳求着。

“不行，这手印一定要押的。”赵大娘沉着脸。

于是，小李带着寒热病，战颤着身体，靠了那外国人的帮助，坐了起来，抖着手指，蘸了些墨汁，把手印押在他的名下。

*

“怎么啦，老徐？”

小李还躺在炕上养病，瞧见老徐同着懊恼，走进屋里，一声不响地，坐在矮凳上，觉得好奇怪。

“怎么啦，老徐？”

老徐望望他，没有声音。

“你说呀！甚么事？”

“铁工场……”老徐有声没气地说。

“铁工场怎么的？”

"铁工场，那铁工场不要我了。"

"不要你要谁？"小李以为只是老徐的活干得不好。

"谁都不要！"

"那末，我呢？"小李急了。

"都不要。"

"为甚么？"

"他们说：没有活，不能白赔本，人都不要了。"

"真的？"

小李差不多又会发昏了。这消息，比头痛，腰痛，腿痛都难受！

他跳了起来，想向铁工场问问：这可是对一个病人的待遇？但是病体虚弱，才起来又马上扑倒在炕上。他喊道：

"这样，就是这样对待一个病人吗？能吗？"

他伤心。他气愤。

"小李小李，别糟蹋自己的身体罢。还是好好的养病，等病好了，甚么法子不好想。"老徐劝慰着，一面摸出一些钱："这儿，三块五毛日金，是一礼拜的工资……"

"怎么只有一礼拜的？"小李又惊异起来了。"还有我的呢？"

"我可不知道，那头儿说，工资都在这儿。"

"这甚么话！"是气愤的叫喊。小李险些气破了肚皮。

"你别气，这几块钱我不要，给你留着养病罢！"老徐慷慨地说。

"那不能！你比我还苦，还有媳妇和儿子，都在等着吃

的。老徐，那不能，你拿去！”小李又加重了口气：“老徐，你一定要拿去！”

而老徐：“不，我不能拿！”

争让的结果，老徐只拿了一半：一块七毛五。

小李稍稍恢复了健康，便上铁工场去。工场里静悄悄地，连个人影都没有，只瞧到皮带和飞轮之间，有一只大蜘蛛在结网。他只好回来等机会了。

老等老等，总是等不到开工的消息。

秋天来了。瓜园里的香瓜，连根已给掘掉，代替了白菜的新芽。屋后的几棵榆树，也停止了撒下满地的榆钱，在秋风里，掉落淡黄的小叶儿。

秋天来了。管房租的那老头儿来催讨夏季的欠租了。赵大娘也好几次来问甚么时候偿还那债款。她声色俱厉地，完全是个索债人的真面目，不是巫婆，也不是女医生了。还有那个外国人，他脸上的微笑变成狞笑，满腔的和气变成恶声了，并且还威胁小李，说再不还，一定捉他去坐牢吃苦，好象非把年纪青青的小李，害得凄凉破碎不可。

可是小李，一点活也找不到。他带着病，到纱厂，到烟厂，到羊毛公司以及各个小作坊，都找不到事。他们都不要小李这样的熟练工。他们只招了许多小孩，十二三岁的小孩，尤其是女孩儿。这里头的理由很复杂，而主要的不过是：第一，小孩不给工资，只贴一些伙食费。第二，小孩更不懂事，随他们想怎样便怎样，不能反对。

这末一来，小李简直没有门路了，工厂拒绝他，穷困围

攻他，寒冷又要来袭击他了。

他的孤苦的人生前途完全陷落在无垠的黑暗里。

但是小李还想奋斗，用他从小练就的刻苦耐劳的精神。

不过，已经很困难了。他，这悲苦的青年人，已经旧病复发，一天重似一天了。

这趟病，是更严重的病，是人生的真病。除非碰到一个高明的医生，能够对症下药，恐怕小李的年青的生命，将会遭了可怜的牺牲的！

“这样，就是这样待一个青年人吗？能吗？”

小李在病中，时常这样问，带着愤怒。

在风雪中

一

青纱帐给西北风完全收拾走之后，天气一天天地寒冷起来，迫得他们不得不下屯。到这时候，他们不能用枪弹，只好用舌头，才能开辟一些新力量。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

和总队联络的道路，已给敌人切断了，使他们更陷于一种手忙足乱的状态中。他们下屯已有一个多月，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了。下屯的时候，松花江才拥挤着浮飘的冰排，而现在，整个江面都冻结，象陆地一样可以走路。大风，暴雪，同着低低的天幕，好象要压平一切的山岭，树林，和住屋，好象要把整个世界埋葬在厚厚的雪地里。

然而，事情和冰雪一样地冻结着。他们都在着急。可是干着急有甚么用呢？谁都知道，即使是潜伏期，也应该是地下的潜流，要是不流，会容易枯干的。他们就只是想不出一个发展的好方法。

他们用枪，正和他们使锄头一样熟练，那知道一用起舌头来，可就很生疏了。他们只说一句话，人们就会反问了两句，一反问，就给问住了。他们虽说认得几个字，可是不会写，

这遭人们的白眼，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胡子”。他们得不到报纸，就是有，也不懂得念，就是念，也念不出大道理来的。他们从前只知道干活儿用手，用刀，用枪，用锄头，就是天上的飞鸟也有法儿对付，谁也想不到干这“大事”，还要用舌头，还要用心窍的呀！

十一个人的小队，在这样的情况下，挨饿，忍冻，遭受白眼，心情已和天气一样，降到冰点下的十多度了。其中最不中用的，要算二头儿，他近来老是没有劲儿，而现在，简直想躺下去了。他不是悲伤地摇摇头，就是说：

“大伙儿散了罢，只好散了吧，不散，也只是自讨苦吃！”

可是别人的心情虽冷，还没有冷到他那程度，听了他的话，一齐反对。因为谁都还记得国破家亡，无处偷生的现实环境。队员之一的小西子，对于这种倒霉的语调，尤其生气。他年青，有青年人的热望和勇气，他的两颊老是鲜红的，一听了二头儿的话，他的颊上的鲜红立刻晕开去，连耳朵也涨红起来了，他大声地说：

“这甚么话！老是那调儿，我已经听厌了！想散，就滚你的，为甚么尽在这儿扯鸡拔蛋！”

“好！你这小子，倒有劲儿！”而二头儿现在可真没有劲儿来镇压他的队员了，他只慢吞吞地说，“那末，你说罢，不散，可有甚么法儿？”

“法儿？”小西子给难倒了，还是不认输：“法儿有的是！”

“在那儿呢？”二头儿的好几个月未刮胡子的嘴唇上，露出一个轻蔑的冷笑。

“不是笑，是想啊！要大够‘家’儿一齐想啊！”

说着，小西子往炕上瞧。炕上蹲着老熊，老李和张大个子。他们怕冷，紧紧地偎倚着，活象灶上的猫儿。

“想啊！大够儿想啊！”二头儿也朝住炕上的人们问：“你们可想出来了没有？——没有吗？都是一些草包呀！哈哈哈！”

这笑声好象针儿，刺痛了每个人的心，又好象冷水，浇落在每个人的背上。

他们一齐用憎恶的眼光，瞧住二头儿。他是那么没精打采地蹲在屋角，象一只闹病的狗熊。他的破棉袄的钮子全脱掉了，一团糟地在腰间束了一条脏得辨不出颜色的布汗巾。他的眼睛已经变得那样没有光彩，清醒时也好象在睡觉。

瞧了他那样儿，他们就有气。谁也想不透从前怎会推他做头儿。因为他能打枪？因为他是大个子？或者因为他的年纪比他们都大吗？不是的。他从前的确有一种服人的魔力，好象吸铁石，人们一接近他，就给他吸住了。而现在，他那种魔力，已给困难磨蚀了，给失望带走了。

二头儿的魔力的消失，当然使这一小队人加快地走上塌台的道路。

可是塌台，那是谁也不愿意的事。就是二头儿，虽然天天在说：“大够儿散了吧，散了吧！”但是他仍然不能象小西子的话那样做，就滚他的。

他们不能分散，就好象冻结了的冰块,天气那样的严寒，冰块那有溶解的可能呢？

二

然而，情形仍继续严重下去。他们绝粮了。因为得不到屯里的农民热烈的拥护和帮助，即使是乞求，也得不到一块大饼的。

乞求没有结果，就有人动蛮起来了。那是从前在旧吉林军中当过一名下士的董国标，饿火引起他抢掠的老脾气。他抢了一个老农妇的粮食。他象饿狗一样，一抢到一块菽米大饼，就奔跑起来。而那老农妇一边追出了院门，一边叫：

“强盗呀！强盗呀！抢东西的强盗呀！”

给雪压得静悄悄的村巷，立即集合了一群缩手缩颈的农民，带着惊奇的眼光，他们呢喃着：

“干吗？”

“甚么强盗？”

“我们屯里出强盗吗？”

“不,不是别的,就是住在我们屯里的那一批好家伙啊！”

“是他们吗？”

“可不是！我早就说他们都是胡子呢！”

“胡子”，“胡子”，老是“胡子”！这讨厌的“胡子”已把队员们的耳朵装满了。尤其是小西子，好象“胡子”已戮穿了他的心，感到加二的难受。他在人群里，苦闷

地问。

“谁？谁抢东西？是我们的人吗？”

回答的只有农民们的轻蔑的微笑，这微笑更伤了他的胸怀。他不禁大叫：

“我们追！追上他，不管是谁，就揍死他！”

象一只野狼，伏下身子，就追上前去，在他的后面，紧跟着他的同伴：老熊，老李和张大个子，以及其他的队员。厚厚的雪地印上零乱的足印。农民们的笨动的脚，又把那零乱的足印踩得更零乱，踩得完全模糊了。

“追呀！追呀！追上他呀！”

人群在发喊着。可是小西子不喊，跑在最前头，眼睛盯住前面奔跑的人——啊！是董国标啊！

“董国标，董国标！”他大声地喊着。

董国标回转身子，站住了。

“是你吗？小西子？”董国标喘着气。

“你干吗抢东西？”小西子也在喘着气。

“饿了，老百姓又不供给粮食，干吗不抢？”

“那不行！”小西子沉着脸。

“干吗不行？”

“老百姓都会说我们是胡子。”

“就让他们说吧！”

“这怎么能！”

“不能又怎样？”

“拿出来！你抢的东西，马上拿出来，还给人家！”

——这简直是命令。

“不还又怎样？”董国标生气了。

“不还就揍你！”说着就是一拳。这一拳打得太猛，把董国标打跌在地上，他手里的大饼一撒就撒了好儿尺远。

人群都赶到了，团团地围住他们，好象他们两人已经变成走江湖的卖艺者。

饿火和愤怒把董国标的眼睛烧得血红，他想猛扑向小西子去，可是不成，已给老熊老李他们抱住了。

这给小西子有充分的时间，从雪地上拾起那块石头般硬的大饼，并且高高地举起来，喊道：

“是谁的，这是谁的饼？”

“是我的，给我吧！”从人堆里发出一个羸弱的声音；接着又看见一只胆怯地伸出来的干枯的手；最后才钻出那个老农妇，怪可怜的样儿，她的眼睛紧紧地捉住那大饼，好象害怕，又再失掉它。那大饼，是她从秋天就储蓄起来，准备过冬的干粮。还给她大饼的时候，小西子的态度好极了，是那样的柔顺，好象在对待他自己的母亲。

“这小子倒正派，是个好人！真好小子！”

农民们这样称赞着。队员们也同样在称赞着，可是没有说出来。

从这以后，农民要是在村巷中碰见小西子，都和他打招呼，有的还站住，并且说：

“小西子，你饿了吧，我请你吃饭去。”

“那怎么能，我不饿！”小西子客气地推辞了。

可是农民不象都市人，很少花样，说请就请，非去不可。

不只是这样，连队员们也时常得到粮食。农民们为了小西子的“正派”的缘故，也同情了他的同伴们，时常有人赠送他们的大饼或高粱米饭。好象小西子的“正派”，已经攻陷了农民们的顽固和保守的根据地。

只有董国标，屯里的农民仍然把他当“胡子”。他的背后，总有人指着骂：“这强盗，这坏蛋！”人们的不至于当面羞辱他，也还是为了小西子的缘故。小西子时常替他讨情：

“谁没有错呢？错了能改，也是好人。并且他真饿啊！你们还没有瞧见他饿得整天流眼水，象漏雨，一滴一滴地，样儿多可怜啊！他原是大兵，吃惯抢惯的。以后，我担保，他再不敢抢人家的东西了。”

因此，董国标不但忘记那一拳之恨，而且成为小西子最好的朋友。他虽糊涂，也知道感戴小西子的好意。

就这样，这十一个人的小队，缓缓地接近了屯里的农民。农民们也有时能把××军的消息，报告他们。

三

他们所得到的，尽是一些不好的消息。××军象冬天的饿狼一样，睁着眼睛，尖着嘴巴，竖起耳朵，到处在搜寻他们的足迹。从农民的口中，知道有一队××军，带着两尊大炮，已一步步地接近这个屯里来了。这队××军，也许已经

嗅到在屯里的他们的气味，也许一点也不知道，只是普通的行军。可是接近着来了，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听到这消息，这十一人的小队恐慌起来了。在这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谁也没有战斗的勇气。可是不战，难道就会有生路吗？他们因为缺少粮食，跑路的能力是减低了，何况在严冬，到处都是厚厚的雪，道路更是难走。而××军有马队，怎能逃得过去呢。而且，往那里逃呢，也许他们已经受包围住了。要是战，又完全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

十一个人讨论了半天，没有一点结果。

而二头儿老是说："散了吧，散了吧。"

可是，现在不只是小西子一个人听了生气，全体队员都愤怒地喊道；

"散往那儿去呢？散往那儿去呢？"

"兄弟们，现在不是散的时候，"小西子的脸，又涨红到耳根了。（大概一受了感情的激动，他总是这样的。）他愤慨地说，"现在是，要死，大够儿死在一起！"

"这话对！"

全体队员坚决的声音，压倒了二头儿，他索性又再蹲到屋角去。而小西子提高了声音，好象在演说：

"可是，弟兄们，我们要死，也不可忘记我们的宗旨；我们要死，非打死了几个××人不可！"

"对！我们要打死××人呀！"

"可是，我们还要瞧情形，好躲就躲，不能躲，我们就只有打！"

这是小西子的结论，是个正确的结论。因为他比别人更能保持着他的斗争情绪，所以会有这出奇的好意见。这意见，谁也没有反对。

但是躲，可不容易啊！要是屯里的农民肯帮忙，躲开××军的视线，倒是好办的事。农民的家，就是最好藏躲的地方，只要一家躲一人，就能避去临时的危险。××军的眼睛，是容易蔽的。可是这办法，农民们不答应，怕受连累。

怕受累，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屯里的农民和他们还有隔膜，还不能完全了解他们，不能把他们当成自家的兄弟一般看待。队员们都感到这一点，小西子尤其知道，而且他正在想一个打破这隔膜的有效方法。他在那一趟的抢掠事件中，已相当把握到这屯里的农民的脾气了。他想：只要有一个机会，只要有一个机会，这隔膜是不难打破的。

而机会终于到来了。

在一个大雪的夜里，他们得到了消息：××军有两大车的军用品，在离屯十几里地的山路间迷失了道路，护车的只有一排人，他们守护到天亮，才去寻找道路。

小西子认为是个好机会，他马上找齐了队员，说：

"兄弟们，我们马上抢大车去！"

"抢大车？你不是说不该抢人家的东西吗？"董国标怀疑地问。

"不！这是不同的，这是敌人的东西！——你多笨啊！"

队员们都笑起来了。

"而且，"小西子又红着两颊了，他继续着，"我们去

打死几个××人，至少也可证明我们不是胡子！”

他好象一天到晚总忘不了洗清这“胡子”的恶名。他认为恶名一洗清，农民就会和他们一致起来了。可是别的队员没有知道得这样清楚，他们只听到打××人，就一体同意。

董国标第一个拿起他的长枪，好象一提到抢东西，他总是精神百倍的。其他的队员活泼地拿起他们的武器，武器一到手，好像大伙儿都有了主意，齐声地说：

“走，我们走！”

于是鱼贯地走出屋外，他们消失在大雪纷飞的夜里。

只有二头儿，苦闷地蹲在屋角，一动也不动。他现在是甚么事情也不出主意，甚么行动也不参加，自然，反对的勇气更是没有的。自从他的魔力消失之后，他那洗刷未净的腐败的泥土气质又在他的体内复活起来了。他现在老是在梦想他的黄瓜园，他的香瓜地，那是多青苍，多可爱的啊……

小西子斜睨了他一眼，没有办法似地摇了摇头，也跨出门去。

四

门外是好大的雪啊！白的雪花把黑夜染成淡灰色了。夜是迷茫而且寒冷。在雪夜中走路，好象在驾云；足下是软软的，眼前是朦胧的，真不好受。

满地的雪花，漫天的雪花。雪花无情地打在小西子破旧的皮帽上，补缀的棉袄上，也打在没有手套的握着枪的手

上，红紫的颊上。要不是寒冷，他会以为他是错跑进纱厂的松花间呢。他在“事变”以前，曾在松 花 间 当 过小工。那时，因为在屯里过不得活，所以到城市去。可是不够半年，而××人来了，纱厂停工，于是他一发狠，就变成一个游击队员——其实，也再没有别的路给他走了。他年青，又经过一年的战争生活，倒把他的身体磨练得那末壮，已是一个壮大康强的“好小子”。又因为他呼吸过城市和工厂的空气，土头土脑的味儿也少些，在农民游击队中，也好象比较别人高明一些；虽然他并没有受过教育，即使有点聪明，也是非常直觉的。但是说到军事学识，他可就不及当过下士的董国标了。

“是小西子吗？”隔着雪，传来一个给冻结了的空气闷住的声音。

“你是董国标？”小西子加快足步追上去：“他们呢？”

“就在前面，我告诉他们在山脚等着。”董国标又加道：“我缓缓地走，在等你。可是二头儿呢，他不来吗？”

“他不来，我也不强他。瞧他那样儿，来了也只会坏了我们的事。”小西子惨笑着，又说：“将来有一天老百姓会拥护我们，那时候也许总会变好吧。”

董国标也笑了笑，谁也分不清他是笑二头儿的消沉，或是笑小西子的希望太天真。他只说：“那末，我们的事怎样动手呢？”

“我想，我想我们只好一齐包围上去。”

“一齐包围？不能吧？”董国标展现他的军事才能了。

“一齐包围是不行的，我们只有十人呢。”

“我们的人真的太少了！”小西子惋惜着。

“也不见得，只要我们有计策。”

“有计策吗？”

“我说，我们用疑兵，把少变多。这雪夜正是个好机会。”

“唔？”

“我们应该分散，”董国标计划着，“分散，分二人到对面林子去放枪，只吓他们。剩下来的，散兵线地包围着前进，可是留下北面山路饶他们逃，等他们走到山里，迷了路，我们才缓缓地击毙他们……”

“真是！多好的战略啊！”小西子由衷地赞许着。“瞧不出你这‘胡子’倒有这本事！”

“得啦，你也来和我开玩笑吗？”

董国标这样说。于是他们俩都大笑起来。

夜雪的村庄中，传来两声狗吠声，和笑声一同打破了那寒冷的原野的静寂。

隔着雪，望见山麓的队员们，好象伏在冰山畔的企鹅，笨掘地在蠕动，伸长脖子在窥望着。他们在等小西子，好象一切的行动，都要靠他来指示，在无形中，小西子已是他们的头儿了。

当小西子走近前来的时候，队员们把他围住了，争问他怎样去抢大车。

小西子介绍了董国标的意见。

“这个意见真不坏啊！”是队员之一的声音。

“董国标，这是你想出来的？真不错啊！”又是另一队员的惊赞。

全队的人都用惊异的眼光瞧住董国标，使他也有点难为情起来了。他好象青年学生向女同学求爱时一般的腼腆，问道：

“不行吗？”

“当然行！”回答的可不是娘儿们的腔调，而是集体的有力的肯定。

于是小西子发命令了：

“董国标和张大个子，他们两人马上去，埋伏在对面的树林里，听见信号就不停地放枪，可是不许站在一道，要来回地走动，使敌人疑惑林里有大队的埋伏——信号是：三下朝天的连珠枪声。记好，马上走！”

谁也没有驳回小西子的话，好象他真的是一个司令官。于是董国标和张大个子消失在夜雪里。而其余的人，由小西子率领，散兵线地在厚厚的雪地里爬行着，好象沙糖堆上的蚂蚁，终于没入在白茫茫的原野之中。

五

第二天的早晨，雪晴了，太阳好象害羞似地只露出了半面，可是柔和的红光已投射到山头，林表，也投射在广漠的原野上。积雪的原野，远远地瞧去，好象镀了一层美丽的霞

采，晴雪的早晨比昨夜还要寒冷；可是谁也不觉得。因为他们的血，都已沸腾在胜利的快乐中了。

他们已获得了二大车的军用品。大车在向屯里来的路上缓缓地驶着，颠簸着，在后面划了几许乱七八遭的轨迹，这样的轨迹，正说明驾车者的技术欠高明。

在晨曦中，在大车的四边，围绕着队员们，在笑着，叫着，骂着。

"小西子，吃劲啊！怎能让它不听话！"

"怎么的？董国标？它不肯走吗？"

"这畜牲，不打不行！"

老李用枪杆捅一捅大车身，好象在对付他的毛驴儿。

但是驾车的小西子和董国标，不管队员的吵闹，用全部精神在驾驶，好象在和发动机作斗争，耳朵也涨红了，眼睛也快睁裂了，满头大汗，满身劲儿在挣扎着——机器，到底比牛马还要野得多啊！

然而，他们是胜利了。他们打死了十个以上的护车的××兵，而其他的吓跑了。他们每个人的肩上或手上，都加多了一枝崭新的步枪，腰间也增加了一个精制的子弹袋，而最使他们每个人得意的，还是脚上穿了刚从死者的足下脱出来的皮鞋，那是非常经穿的发光的黑皮鞋！

"××人真不错啊！他们送给我们这末好的礼物！"

原野充满了胜利的声音。而这胜利，好象自己长了翅膀，立刻飞到屯里去，飞到每个农家去。于是在屋前，在窗下，娘儿们象春天的燕子一般，饶舌起来了。他们呢喃着，

传说着，而且夹杂着许多羡慕的惊叹的语气。

“嗳呀！听说有两大车啊！两大车的丝袜子，丝手帕，还有花洋布呀！”

“真是！那是屯里有钱也买不到的！”

“怎会有，‘关里’也怕没有呢，都是东京货呀！”

“有是有的，可是，可是……”

“不！是城里来的东西呀，屯里那儿有呢，老姐姐，你这话不对！”

“我说，听说还有值钱的金戒指！”

连金戒指也给风传出来了！这风传真的越来越动听，连男人们的心也给打动了。

整个屯里的男女们，好象赶庙会似的，都忙着跑到村前，远远地欢迎着那被认为十分珍贵的大车。

装得满满的大车，轮子半没在雪地里，发抖着，叫喊着；喷着白气，不愿意似地爬行着，笨得好象猪。

于是农民们大笑起来了。

大车停止了，这并非已经驶到了应该停止的地方，而是给农民们紧紧地围住，再不能前进。

小西子从车前的坐位上站起来，在揩脸上的汗水，同时，他已听到千百种问话的声音。

“小西子，是从那儿搬来的？”

“里面是装些甚么东西，小西子？”

“这，这是给谁的？”

“小西子，里头有花洋布吗？”

“还有金戒指，是吗？小西子？”

四周尽是叫问小西子的声音，可是小西子一句也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他也还没有详细地知道车里究竟是些甚么。得不到回答，于是有人动起手来了。

“别动啊！这都是炸弹！”小西子微笑地大声恫吓着；“都是炸弹啊！”

不是炸弹，大车上一包包的都是军用的衬衫，袜子，皮带，还有大量的干粮。不但没有炸弹，连一粒子弹都没有的。

在队员们动手搬下东西的时候，小西子已经充分地感到围观的人们的贪馋的眼光，而且还听见：

“这是多干净的衣服啊！”

“这是多结实的袜子啊！”

“要是能得到一……”可是难为情地中止了。

这一切渴慕的低语，都清楚地印在小西子的心田里。他想，这是最好的机会，这是个表明反×游击队的真精神最好的时机。于是他召齐了队员们，提出他的意见：

“兄弟们，我以为，我们抢来的东西，应该分一些给老百姓。”

可是张大个子第一个不赞成：“这不行！我们辛苦了一夜，我的手都给枪筒烫坏了，而他们，舒舒服服睡在家里！”

“而且，而且，”董国标也说了，“他们总是骂我们是胡子，是坏蛋！”他仍然没有忘记他的被辱。

“董国标，我们不应该这样说，”小西子沉着脸。“就

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们，才分给他们。分给他们，才可以证明我们不是坏蛋！”

十个队员集合在一起，开头低声地争论着，后来，连脖子上的血管也澎涨起来了，而终于同意了小西子。于是小西子跳上车去，宣布道：

“同胞们，兄弟们，我们得到的东西，都不算我们自己的，我们要分给大家呀！可是，粮食，我们应该留给我们自己。”

“不要粮食！我们要袜子！我们要衬衫！”是群众喜乐的喊声。

“好的，好的！那末，那末……”

小西子的话还没有说完，人群大乱起来了，大家争着拿东西。

“一人只拿一件！”小西子站在大车上叫着，“一人只拿一件，要不，就会不够的！”

可是谁来听这话呢。而且人群的杂乱的叫声，已把小西子的话淹没了。

叫骂声，被践踏的呼痛声，小孩被碰倒的大哭声，娘儿们的尖锐的叫唤声，诅咒声——总之，闹得一塌糊涂！

队员们都站在大车上，瞧得大笑起来了。

“这不行！老太太和小孩会给轧死的！同胞们，兄弟们！缓着，缓着拿呀！”

可是没有人来听小西子的大道理。

“停一停！真的会挤死人啦！”小西子的喉头几乎叫破

了，仍然没有效果。他一急，就朝天放了一下枪。枪声把队员们吓了一跳，本能地拿起自己的枪来。而群众也突然地呆住了。

“同胞们！兄弟们，这不行！还是我们分给你们吧，一人一件，你们自己不许动手。象这样会闹出人命官司的。”也不征求人们的同意，小西子就向队员们叫道：“兄弟们，下去，保住东西，不让他们乱拿。你们给，一人一件。马上，下去！”

这样，事情才能顺利地进行。

小西子站在大车上，瞧着农民们得到了战利品时的喜乐的面孔，道谢的声音，自己也快乐得挺直腰，仰起头，把长枪倚在胸前，交叉着两手，迷着眼睛在微笑。在朝阳影下，他的红红的两颊，放射出得意忘怀的光辉；再配上一片白茫茫的雪的原野，积雪的远山，象开遍了繁花的雪的树林，作他的背景，简直是抗×武装队里的一个青年英雄的特写的画面！

“你们快瞧！瞧瞧小西子的样儿！”董国标一面忙着递给一个老太太的袜子，一面低声地对他的同伴们说。

队员们瞧着小西子，不约而同地笑了。

六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屯里的孩子们突然噪起来了：

“瞧飞艇啊！瞧飞艇啊！”

接着，在屋里也可以听到飞艇行驶的轰轰声。于是，在寒冷而净洗的天空中，出现两架飞机，在淡黄的阳光里翱翔着，打转着，闪着银光；而且飞得那末低，差不多要碰着带雪的树梢。

虽然自从“事变”以来，满洲的天空已成为××军的飞机世界，但是这个屯，可难得瞧见一二趟，所以一有飞机，无论屯里的男女老幼，都分成一小堆一小堆地集合着瞧，带着惊异的眼光。而小孩们，却大声地唱：

“飞艇儿，
飞飞飞！
你要到那儿？
我们这里，
可没小鸡儿……”

于是给爹娘们的怒声叱住了——天真的村童们，还以为飞机象老鹰，要的是雏鸡儿啊！

“那是侦察机，××军也许要来轰炸我们了！”二头儿担忧地说。

“只是侦察吧？”董国标也有点烦恼了。

“侦察也好，轰炸也好，我们总不能等着死。”小西子说。

“可不是，”董国标同意着。“还是躲一躲吧，象我们现在的情形，只好躲一躲再说。”

“一点准备都没有，躲一躲，也好，可以保一保力量。现在老百姓不会不给我们住的。”小西子慢吞吞地说，好象

陷入沉思之中。

“这只是你个人啊！”一提到和老百姓打交情董国标就有点着急。“说到我们不见得肯答应。”

“不会的，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好人！”

“好人，也只有你啊！”

“不会的，难道这几天还有人嘲骂你吗！”

“没有啊！”

“那你又何必多心？老百姓现在是相信我们的。”

于是董国标笑了。

只有二头儿他不愿意住到老百姓的家去。他认为老百姓要是好的，早就参加游击战，而且不应对他们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战士冷淡的。他不信任老百姓一定要死守着。他说，这是他的最后的“营盘”，他誓不离开它。他将永远守住这个在屯的东头，前无邻后无舍的老屋。这屋，是他们刚下屯来时，凑合住下的无人的破屋。这不是他有意闹脾气，他本能地认为这躲的方法，太丢脸，一点也没有英雄气概。他从开始战争以来，没有瞧见过这无耻的行为：害怕××军！而且，还没有知道敌方的情形，就定下这辱没游击精神的行动；他无论如何不愿和队员们一同躲进。他以为，既不应该讨好于老百姓，更不应该躲避××军。

“我只懂得，有一个打一个，象现在的办法，我真瞧不过去！”他发恼着。

“可是，可是……”

“可是，可是我怕死啊！要是怕死，何必来呢？”他不

愿意听小西子的解说，同时，他也忘记了从前他是主张“散”最力的一个。

“可是，二头儿，我们不该吹牛……”

“我们不该，我们不该躲！你懂得没有？你老说有办法，原来你的办法就是这样，躲！算了吧，你们怕死的就躲吧，别啰苏了！横直我的话现在是不值钱了！”

“谁说的对就跟谁做，何必……”

“别说了，好不好？我可不走！”

不走，也只好让他。

于是小西子他们十个，各自分散地住到农民的家里去。农民们都用笑脸迎接着他们，连董国标也领受了许多殷勤的脸孔，这使他更相信小西子的说话。老太太们一碰见队员们，还会问：

“大哥，甚么时候才会把这批鬼子赶跑呢？”

甚么时候呢，董国标不能说，只回答她们一个傻笑。

可是小西子，他的回答就不同了。

“想是那末想，”他说，“可是还难说那一天，我相信总有一天给我们赶走的。”

“这可不容易啊！”

“当然不容易，可是也不难。”

“鬼子有飞机有大炮！”

“我们也有，可是不多，可是我们人可多，顶不行顶不行，就是十人打一个，也可以对付得了。”

“真是！我们那一天不想对付，也和你们一样啊！”

“真的？”小西子的眼睛发光了，好象发见了宝藏。

“那有假！我们的田都给荒了，粮食也卖不掉，干活也没有活干，老是这样的，怎样过日子？”

小西子点点头，深深地了解这屯的农民们，也有他们一样的心。可是他不敢马上请人家加入队伍，怕人家不答应，反弄出了毛病。但是，他换了另一种方式，到处说着团结多人，就有力量。

就有力量吗？小西子有时自问着，也许人少也不坏吧，他们不是十个人战胜过××军的护车队吗？可是，可是，不，他想总是人多的好。队伍有了发展，不是更好的事吗？于是他坚信地说：“人多就有力量！”

七

夜里，小西子宿在一个快乐的家庭里，这一家，有老太太，有媳妇儿，有儿子，有孙子。这是个繁荣的家庭。在大粮户，村长一类人禁不住吓，已到外方逃难的这时候，不能不说这是美好的家庭。这家庭的老太太，用她的爱儿子惜孙子的余情，来款待这位年轻的生客。

“你年纪轻轻的，就离乡别井，在外头吃苦，真是太…太…我不好说，真是太…”于是她用慈悲的眼光望着小西子。“甚么，你的家都给毁了？没有家？嗳，那多可怜啊！好吧，你就待在这儿，我们愿意的。可不是吗，都愿意的。人家都说你是好人、好的……是的，年纪这末轻，怎会坏

呢……”

于是她吩咐媳妇儿，今晚特为客人下锅烧饭，虽说只是高粱米饭，可是热腾腾的，而且还有香油皮，有大葱，饭后又送来烟蓬蓬的手巾，送来热开水，十分客气，这使小西子非常感激，涨得两颊通红了。

老太太的“老头儿”，在“东线”上干活，不常来家；而儿子，本是在绥芬河开小店，因为事变后没有生意，停了，待在家里。儿子是用小店东待客的方式来招待小西子的，他老是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中国人，何必客气？”可是他自己倒非常客气地把小西子服侍上炕，而且不断地问：“炕不热了吧？被窝太薄了吧？不冷么？……”

“行，都行，太好了！真感谢！”小西子几乎来不及回答。

“说那话！大家都是中国人，何必客气，大家都是……”说着他自睡觉去了。

可是小西子不能马上睡，因为被窝太暖和了。那末暖和，使他在思想着一个暖和的家。真的，他需要一个家，他应该娶媳妇，他要安乐地过活着。这游击生活，太苦了，不能安定地吃，不能安定地睡，镇日只和原野的风，原野的雪作斗争；只在烈日暴雨之中，飞机大炮之下讨生活——真是太苦了……

他想着，想着，就睡不得觉。屋外，寒风在呼啸，雪片在低吟。可是他在炕上，翻来覆去，觉得滚热。

他忽又想到在纱厂干活的时候，有个女同伴，叫张秀英，

对他很好，他每天总找机会和她搭讪着。有时，还在那工厂后边的柳树下，闲谈着，等着调班。虽然没有甚么好说，可是觉得有味。要是，他妈的××人不来，不会失业，也许可能娶她，看她那样子，是会愿意的。可是，可是，“事变”了，甚么都变了，谁知道她往那儿去，也许给……

最后，他不能不诅咒那造成“事变”的罪人，于是他在被窝里，紧捏着拳头，狠狠地说：“只有打！全打死他们！”

这末一来，他又关心起他们的队伍了，他们将怎样保全力量，又将怎样发展呢？还有，还有二头儿，他为甚么要和我闹意见呢？……

第二天，××军并没有来。而天气倒是一个美丽的寒冷的晴天。近日来的天气倒怪，夜里下雪，白天放晴，一早，太阳就露脸了。

二头儿坐在他的“营盘”的门口晒太阳，还是病老熊的样儿。听到过路人的踏雪声，眼睛就张开一下。

队员们倒象鸽子，总是忘不了老巢似的，一早就有好儿个人集合在破屋的门口，也和二头儿一样地在晒太阳，而且低声地在议论着谁家的媳妇儿漂亮。

因为昨夜的失眠，小西子起得迟一些，可是在老太太的殷勤招待中吃了早饭，也习惯地踱到这破屋来了。他一到来，队员们的低语就停止，互相自语着，好象说：他来了，不许说这无聊话！

二头儿又张开他的朦胧的眼睛，瞧一瞧小西子，说：

“呀！你也来了？干吗来？你瞧，我还是没有事，没有

死！”

“也不见得活吧？”小西子有点气。

“好，就算我不死不活吧，可是我不怕死。怕死，那多臊！哈哈哈！”——又是他那冷酷的笑声。

小西子难以忍受地走开去。老李和老熊跟在他的后面。

“小西子？你为甚么怕他？”老李问。

“我怎么怕他呢？象他那样，和他争也争不出道理来的。”

“要是我，先揍他几下再说！”老熊说。

“打了又怎样呢？他能好吗？他专和我赌气。我要是和他翻脸，可不给人家笑话了吗？”

“谁笑你？”

“全村的人，都会笑我们自伙儿不和。”

“甚么不和，他是和你吃醋！”老李认真地说。

“吃甚么醋呢？又没有娘儿们？”

“他瞧你做事，太象个头儿，他过不去。”

“我又没想当头儿，谁争他的？”

“那是他自己不好，他说的话叫人老不服气。”老熊说。

“可不是，我们做事，是为大家，要是误会我和他争头儿，倒可笑！”小西子有点烦恼，第一次感到做人不容易。

那是谁的错呢？他自想着。

“象这样，一点次序也没有，我们的队伍快会灭亡了，

用不着××军来打我们的。”老李说。

“可不是，小西子，我们打倒他，不给他做头儿？”老熊简直在煽动小西子了。

“别提打倒罢！打倒只用到敌人身上，我们自己人用不着！”小西子沉着脸，认真地，而且两颊又通红起来了。

八

××军还是没来。可是二头儿的性情变得可怪了。他不象以前一样的不管事，躲在屋角里。他老是发牢骚，有时甚至于在夸耀从前当胡子头时的英勇行为，怎样地一个人一根枪可以战胜一大队的官兵，怎样地在黑夜里偷窜过敌人的二道防线，而且防线上的哨兵都给毙掉。每天他坐在他的“营盘”门口，一面晒太阳，一面哗啦哗啦地噪着，好象市场上的说书者：

“……子弹从头上飞来，我就把头一低，没有打中我，那末我就放枪，对准官兵的半腰放，他一低下去，啪，正打个中，打中他的头……”

他指手画脚，神气十足。上午，孩子们和几个屯里的空闲得无聊的老头儿，给听住了，用他们的左手，摩挲着稀疏的胡子，点点头，有的微笑着。这使二头儿更兴奋，越发打起精神，连他的终日瞌睡的眼睛也醒了大半。而到了下午，人们越聚越多，在二头儿面前的雪地上，画成一个弧形。渐渐地亦有老娘们参加着，而小孩们不用说更是高兴。队员们亦

有几个站着瞧热闹。

“二头儿，旁的别说，就说和官兵打仗吧！说官兵打仗吧，二头儿！”小孩们嚷着。

于是，二头儿又在夸耀他打枪的本事了：

“……子弹从头上飞来，我就把头一低，没有打中我，那末我就放枪，对准官兵的半腰放，他一低下去，啪，正打个中，打中他的头……”

于是老头儿用他们的左手，摩挲着稀疏的胡子，有的点点头，有的微笑着。间或杂着小孩们的哗声。——这情景，好象完全是太平景象。

可是这景象，苦恼了小西子。还有董国标，老熊他们，也觉气愤。

“完了，我们完了！”小西子感到非常痛苦。他走进人群去，穿过那人身的弧形，走到二头儿旁边：

“二头儿！”小西子郑重地说，“你可是疯了？”

“我不疯，倒是你疯了，连我说话也不行吗？”二头儿又冷嘲道：“还是快躲吧，××军快来了！”

小西子还不及回答，老熊冲上前来捉住二头儿，就是一拳。没有打中，给小西子阻住了。

“告诉你，要是再胡闹，要你的命。”老熊气愤地大声说。

“我要你马上住口！”董国标走上来，也是怒冲冲的。

“这可不行！你们几个人打他一个子！我们也觉得不平呢！”人群里有一个老头儿，颤着声音说。

小西子向人群看了一眼，痛苦得几乎流眼泪。可是没有办法，他真想不管一切？飘然而去。但是，不行，他的内心好象有一种力量迫住他，叫他一定要负责解决这难题。而这难题的解决，可有点超过他的能力。他不能理解，这是一种倾向的斗争，他只想和平地了事。然而，和平的办法呢？

在表面看来，这不过是个人的行动，没有理由压制二头儿的，但是这行动，影响整个的工作多大啊！那可能分裂他们的团结，那可能失掉群众的信仰，那会使整个屯的老百姓，忘记了敌人，忘记了在最近期间内，就会到来的××军。而且，在这屯里，游击队的信仰，刚刚能够建立来，还未能谈到组织工作，而且，而且快要来临的敌人，他们的力量比较还要大好几倍呢！

但是，办法呢？办法只有二条：一条是让二头儿的自由发展；另一条是劝阻甚至于强迫他停止无意识的行为。

小西子是赞成劝阻的办法的。可是二头儿能劝导得好吗？……

看，二头儿又在那儿指手画脚地夸耀着："……对准他的腰，啪，正打个中，——打中他的头……"他把自己的拳头碰着他的前额，很笨地装着倒下去，不提防脚底下的雪滑，哗喇一声，真的滑倒在地上。于是人群哗笑起来，小孩尖着声音叫好。

小西子也觉好笑。他觉得二头儿可怜又可气。他料定二头儿的精神一定很苦闷，要是不，不会这样失了常态的。那

末，为甚么会失常呢？他不能理解了，——其实，即使是了解了原因，也不一定能马上说服二头儿的，因为这情形，并不是短期间内所形成的，只好缓缓地转变，只有在斗争的洪炉中缓缓地锻炼，才能把过去紧紧地黏在心的深处的魔鬼肃清的。

可是小西子未能理解，所以他感到痛苦，伤心。为甚么好好的一个人，会变得这样呢？一伤感，更没有能力来解决目前的纷扰了。

可是，董国标和老熊，可不顾虑一切，把倒在地上的二头儿，一拖就拖到破屋里，解开二头儿腰间的围巾，把他的手足都捆住，说："你还扯鸡拔蛋不？"

"好！你们这样对待我！我是强盗吗？我是敌人吗？你们这样对待我？"没人理他，于是他号叫起来了："救命啊！救命啊！"

"不许叫！"董国标大声地威吓他。

"救命啊！救命啊！"

"告诉你不听，还叫，妈妈的！"说着老熊就是一拳，结实地打在二头儿的背上。

二头儿不叫，可低声地哭起来了。

"怎么？哭啦！哈哈哈！"董国标由衷地笑出来了。

在笑声中，冲进小西子，他惊异地问："干吗？"

"你瞧，你瞧，他可哭了！哈哈哈！"董国标还是笑。

二头儿蹲在地上，哀求着：

"小西子，你是好人，他们都听你的话，叫他们放了我

罢！”

“你为甚么胡闹呢，可不掉我们的脸？”小西子问。

“没有，我整天没有事，闷煞我。我说话，只是解闷儿，并没有掉谁的脸。”

“这还不掉脸吗？人家不说你有神经病，倒以为是真的，这可给人们不好的影响。”

“影响，我还能影响人家吗？”

“影响有好坏，你是在影响人家走向坏的道路。”

“我并没有啊！我叫人家不打××人吗？没有啊，可冤枉啦！”

“你没有叫，可是比叫的更坏，懂吗？”小西子倒有耐性。

“不懂。”

“你是头儿，头儿不干点正经，尽在扯鸡拔蛋，怎么能叫人起来打××人呢？”

“那末，要我怎么样？”

“你应打起精神起来努力，干点事。”

“我觉得没有事可干，甚么事都没有意义。”

“那末打××人可有意义？”

“有意义，可是我们没有力量。”

“那就糟啦，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我们的力量在那儿呢？没有啊！”

“我们不去和老百姓一道，不去叫他们和我们一同起来打××人，尽在那儿象你那样扯鸡拔蛋，那来的力量

呢？”

“好！那末，我就不响了。”二头儿急想松他的束缚，直接了当地说。

“真不响了吗？”

“真不响！

“要是响呢？”

“毙了我！”

“那末，我解开你。可是你不能忘记我们的约定！”

“好的！”

那末，二头儿被松了缚，从地上爬起来，眼里还挂着残泪。

九

二头儿不得不沉默着。可是他感到一种难堪的寂寞。寂寞好象毛虫，咬着他的内心，那使他坐卧不安。他觉得屋里的四周都有一种瞧不见的力量来压迫他，恐吓他。瞧！那从没有烧火的土灶，正象一座古坟，中间张开一个大圆口，好象要来吞吃了他；那根躺在墙角的步枪，好象一根可怕的魔棍，闪着黯黑的幽光，在缓缓地爬起来，好象要来鞭鞑他了！

他不能忍受。他跑出来坐在门口。可是立即就有一群小孩来围住他，要他说打枪的故事，嚷着，噪着，见他默默地坐在那儿，就推他；

“你没有聋吧，不听见吗？怎么不响？”

他不响，他有约言，不遵守便会给毙了。小西子那小子，说得到就做得到，不能开玩笑的。于是他不响。

可是小孩尽噪，尽推，使他不能安静。他忍不住了，大声地号叫：

“滚！滚开去！”

小孩们给吓跑了，站得远远地，向他挥拳头。

“倒霉！”他自说着，又往屋里去。可是屋里多可怕呀！那土灶，那步枪，又在烦恼他了。

他又从屋里走出来，望一望门前的景物。景物给雪盖住，只见无垠的一片白色，单调而又渺茫望不见稻田，也没有他梦里的瓜园。他为要避免小孩们的麻烦，无目的地走着。小孩们远远地跟在后面。

他碰见屯里的住民，他们就笑着问：

“二头儿，你怎么就哭了？”

要是碰见老熊或董国标，他们就狠狠地啐了一声。那是在唾弃他，他知道，但是他没有犯了天条大恶啊！

他的心非常痛苦，可是找不到诉苦的人。人们和他谈话，都是客气的敷衍，没有真心，那又何必说出他的痛苦给人家做嘲弄他的资料呢？

他沉默着，可是沉默咬着他的心。他觉得，他不能忍受下去。

最后，他下决心去找小西子，向他要办法。他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找到他。也不管小西子正在和人说话，一把捉住

了：

“小西子，救救我吧！”他哀求着。

“甚么？”小西子倒吃了一惊。“啊，二头儿，干吗？又有人打你吗？”

“不！不！没有，可是，可是……嗳！”他沉重地叹息着，好象这一叹息，就说出了他的心中无限的痛苦。

“到底有甚么事？”

“我，我住不了，那屋，那屋甚么都可恶，都欺压我！我真的住不了！”

又是傻话！小西子摇摇头。

“那你就住到老百姓的家里吧！”小西子又加道：“要是你没有认识的，我替你介绍一家。”

“不，不是那意思，我说，任何的家，我都不能住。真的，这个世界，整个的，我都不能住，我太孤单了！”

正在和小西子谈话的两个青年农民张开惊异的眼光问：“甚么回事？”

“谁知道他？”小西子蹙一蹙眉头。他转向二头儿：“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求你，求你教我活下去的办法。”

“你现在不是活着吗？”

“不，我活，可是太苦了！”

“谁不是一样的苦？”

“不，你们有说有笑，象生活，可是我，没有，周围都没有同情我的人，连东西都在嘲弄我。”二头儿痛苦地叫

着。

“这是你不好，从前谁都听你的话，可是，你现在尽是扯鸡拔蛋，谁都不爱听了，这是你自己不好。”

“还不是一样，我还是我，只是感到太孤独了。”

“算了，算了，别来缠我，我正忙呢。”说着，小西子转去向着青年农民，继续他们的谈话：“那末，你们说有二十根枪，藏的地方你们知道？”

“知道的，是我们一同掘地藏好的，”青年农民说。“我们也有人，都愿意打××。”

“怎样？有人？在那里？”小西子高兴极了。

“这屯里啊！我们早就约好，要去，就大伙儿一道去，都一条心，那是在‘事变’时就有了这个心的。”

小西子的发光的眼睛燃烧着，说：“那你们怎么不早说？”

他们笑了笑，一齐道：“这那能随便说呢？多险啊！”

“没有危险的。难道这屯里还住警察吗？有×奸吗？”

“知人知面不知心，可说不定。警察，可早躲啦。不过，我们要参加，也要瞧定好的队伍，要是不好，那不是白送死？”

“那你们瞧定我们是好的队伍吗？”小西子笑了。

“是的，你们的队伍是真正打××人的。……”

二头儿叹叹气，好象要说甚么，小西子马上抢着说：“二头儿，你还是回去，等一等到你那儿去，我和你谈谈就是。现在，请你回去。”

小西子从没有这样温和地对待他，这使他感激，几乎淌下眼泪。懒洋洋地跑出屋外，二头儿踏着雪，跨过院门消逝了。

“二头儿的样子多可怜，他是你们队伍的头儿？”青年农民问。

“从前是头儿，现在他不干了。”小西子解释着。

“他太不行吧？一点神气都没有。”

“是的将来大伙儿合起来：从新举过，不要他，不成问题的。”

“对了，头儿要能耐一些才好。”

小西子表示同意，点点头。

十

虽然××军仍是没有来，可是屯里充满了抗争的空气。

薄暮的时候，屯里来了一队难民，携男带女，风雪满身，脸孔虽说是中国农民的吃惯苦头的无表情的脸孔，可是在脸上的皱纹间，可以瞧见忍挨饿冻的余痕。他们是从×城的近郊逃荒出来的。那城市，已在××军的炮火下轰成灰尽了，因为那城市的居民的抗争。可是不抗争，难民们说，也一样过不下去，强抢强奸，无所不用其极，从未见过这样蛮的军队。

“那是真话，我们的毛丫头才十四岁，就活活给弄死了。你瞧，他们多蛮啊！”说话者是个中年的娘儿，胸前还

抱一个才满周岁的小孩子。

毛驴的长叹，小马的悲鸣，小孩们的啼哭，笼罩住这逃难者的行列。他们沿着村巷走着。在院落的门口，墙脚下的木桩上，他们坐下来，拆开包袱，寻找干粮充饥；也有沿门乞讨的。驴和马一停下来，就撒尿扯粪，把村巷错弄成牧场了。……

他们是准备在这屯里宿夜。

这给屯里的人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且从难民的口中，知道军队到处，毫无幸免者，于是全屯的人心沸腾起来了。

同时，小西子和那接洽的青年农民已把枪杆从地下起了出来，秘密结合的一团也已集合起来了。他们好象导火线，而小西子就是火引子。这火，燃着屯里每个人的心，于是抗争的空气，弥漫了院落，村巷，而布满了整个屯子。

这时候，不只小西子，就是董国标，也变成忙人了，因为屯里的人们到处在找游击队员的领导。

"这很好，这很好，又有十二人，成立一队了吗？"董国标笑着脸，在和找领导人的农民谈话。一瞧见老熊，他就："老熊，老熊，你怎么了，尽在瞎跑！这儿的人都忙死了！"

"怎么我瞎跑呢？"老熊跑过来，说："你可知道，二头儿掉了？"

"掉了算了，这时候谁有工夫去管他，而且，那末大，又不是小孩，怎会掉呢？"

"这可奇怪，我也想不懂！"老熊接着说，"谁也不知

道他到那儿去，枪也不带，现在给我拿来了。”说着，老熊动一动手里的那根曾躺在屋角威吓过二头儿的步枪，又继续道：“小孩们说，他一直往屯外跑，向那林子里走去，直到这时候没有回来，这可不是掉了？”

“谁说不是，掉和不掉不是一样吗？也许掉了他更好吧？”董国标不管老熊还有话说没有，就和那找领导的人一同走了。

老熊低声骂了一声，转身走向队伍的办事处去。办事处是从前大粮户的院子的东厢房，已经得了守院子的老头的同意，才建立起来的。老头的儿子，就是秘密团结中之一人。

老熊在路上，又碰见了小西子，他也是要到办事处去的，在办事处，有好几个新成立的小队队长在等他。

“小西子，你知道了没有，二头儿掉了？”老熊说。

“怎么，二头儿掉了？昨天夜里，我本想去找他，可是分不开身，就没有去。你知道他为甚么跑掉呢？”小西子走到老熊的对面，站住了。

“谁知道，我也莫名其妙呢。”

“不是跑掉罢？”

“确是不见了，这是他的枪。”老熊举一举起他手里的长枪。

“唔。你找过他吗？”

“可没有细找，不过我敢说，他是走了。”

二头儿走了，小西子的心有点难过起来了。虽然他从前恨二头儿，也骂过他，可是总是个同伴；而且小西子第一天加入队伍，就和他一道，这一年多的共同生活，这一种同伴之

情，好象突然地给翻了起来，使他的心绪有点凌乱。可是，找他去吗？那不能！小西子自己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干，是够忙的。要是放下集体的事情，而去找他，为的是要安一安自己的私心，那是不行的。于是他对老熊说：

“我们到办事处去罢，二头儿的事情，就让它去吧。”

作为办事处的那屋，屋里挤满了十几个农民，大都是跃跃有生气的青年分子，好象抱了必胜的决心，脸上充满了一种英勇的神气。他们在等着小西子，等他来集合着成立总队的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二头儿的失踪消息，这时正在议论这件事。当小西子和老熊跨进院门的时候，屋里传出一阵喧哗声：

“……那末，我们应该推谁做头儿呢？”

“还用说吗？”

“你到底想推谁？”

“我吗，小西子！”

“同意！我们都推小西子！”

“大伙儿都同意！”几个声音一齐说。

“我说，我说今天就举定他！”

“行！”又是好几个人的声音。

“行！总队长。”老熊拍一拍小西子的肩膀，又向他行了一个军礼。

小西子只说“你别闹，你别闹”，微笑着，一大步就跨进屋里去。

哈尔滨的一夜

这是我到哈尔滨第一天的遭遇。

当我和到车站接我的陈君，突出马车和汽车的重围，走上松花江街的时候，夏天的绿色的哈尔滨，在我这新来的外乡人面前展开来了。

也许是午梦未醒吧，为甚么低低的绿荫，绿荫丛中的洋房，都是那样闷沉沉呢？也许是给天空的日本飞机激恼了罢，为甚么茂密的树林中，听不到一声鸣蝉，一声啼鸟呢？

——啊，多么沉闷的哈尔滨的夏天呀！

我带着郁闷的心，跟着陈君走上南岗的斜坡。后面是一层低似一层的绿林，前面是缓缓升高起去的石头道。一条条笔直的浓荫小路，从石头道两旁伸出去，伸得远远地好象没有尽头。路上瞧不见行人，只是矮篱笆的花丛中，有时传出一阵小孩刚刚睡醒的哭声。在小树林里的长凳上坐着的中国人和老毛子，都板起一副苦脸，怪不合卫生的。

——啊，多么沉闷的哈尔滨的夏天呀！

我不禁呼了一口气。

“累了吗？西八乍市快到啦。西八乍市有地方给你住。”陈君一面走，一面说。

“是谁家？”我凑近陈君的身边问。

“老李家。”陈君又接下去：“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当过义勇军，现在住在此地。你就在他家住十天八天罢。”

“他乐意吗？我可不认得他。”

“没有关系，我早已告诉他了。他是一个儿住的，很方便。”陈君又加道，“他这人又热情又爽快，就是爱说话。”

说着，我们已闯进一条狭小的街道，道旁的木板路在脚底下咕嗒咕嗒地响了起来。一位老毛子老太太，坐在她自家门口，睁大眼睛望住我们，望得那样狠，象在生我们的气。她门前的木架上，横七竖八地晾着衣裳、围腰、被单和白台布。站在斜对面的另一位毛子太太，在低声叱着她的狗不要瞎叫。有两位中国老娘们站在当街的玻璃窗里往外窥望，一瞧见我们都是中国人，便别转了她们的脖子。从一家地下室涌上几个毛子小孩，手挽手地站在一堆，瞧着我们，又耳语着，忽然哈哈地大笑，跑散了。——这外国村落似的西八乍市，来了我这外乡人，一点儿也不能安静下去啦。

走到七道街，陈君伸手拉开一扇钳着漆布的大门，门铃立刻玎珰着，马上又传出一阵毛子姑娘的柔和的声音：“克多？”接着走出一位光臂膀的毛子大姑娘。她一边走一边捻起束在胸前的白围腰，在抹干她手上的水珠儿。瞧见熟识的陈君，她笑了笑，打起中国话来：

“不在，他。”

但是陈君拉我进去，指那第七号的房门，告诉我，老李就住在这一间，又回转身子，用俄国话介绍我给那毛子姑

娘。她活泼地和我握握手，问我懂不懂俄国话，我摇摇头，而她乐意地笑了。

我留意那屋里，门对门也有十几间房子，是寄宿舍的模样。据陈君说，那毛子姑娘是房东太太的女儿，没有父亲，父亲是在欧战的阵前牺牲了的。

打寄宿舍走出来，陈君因为有要紧事，不能再陪我去逛逛。他告诉我最好到道里公园消磨过这下午，并且教我怎样上电车，那里下车，便分手了。

如果是有福的人，象我这样独行踽踽于异乡的街道上，他一定会弄些甚么乡愁旅思，如果是情感热烈的人，象我这样飘泊于"满目异类"的都市中，他也许会痛哭狂歌起来。但是我，因为在中东路四等车里不能好好歇息，只觉得满身不得劲儿，无精打采地上道里公园去。公园里非常热闹，有买汽水的露台，有日本女人的纳凉亭，还有电影院，院前的无线电机闹得震天价响。而我不顾一切地躺在一片僻静的青草地上，睡了大半天的觉。

等到我乘电车再上西八乍市，已是满街灯火了。我在车里，尽在想象老李是怎么一个人，如果他不招待我，或者不知道我今晚要上他家睡觉这回事，岂不是要在街上作夜游神了么？

但是，不，那毛子姑娘一瞧见我，便说，第七号有人，叫我自去敲门。敲了两下，门开了。背灯站在门口的并不是甚么老李，而是一位青年女子，这才把我呆住啦！

"找谁？"她问，用机警的眼光上下打量我。

“李，李先生在家吗”我客气地说。

“老李？”她怀疑地反问着。又说：“你是谁？”

“我姓郝，奉天来的，刚才和陈先生来过。”

“啊呀！你就是郝先生吗？请进来，请进里面坐罢！”她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

这时候，该是我满腔狐疑的时候了。我狐疑地坐在椅上，狐疑地望住她，狐疑地擦擦自己的手掌。她是谁？是老李的老婆？情人罢？要不，又是甚么人？我不致走错了房间罢？

“你认得李先生？”我终于忍不住了。

“怎不认得，天天在一起呢！”我的话好象把她问恼了。“难道你不知道我？”

“不——还没有请教呢。”

“真不知道？老陈没提起？我就叫佟桂英。”

“？”我简直怀疑她和我开顽笑。佟桂英是何等英勇的一个女子，朋友们都称她是满洲的马柳特加的。而对面的她，瘦长的个子，怪柔弱的样儿，怎能叫我好相信！

“十里堡的事情，你该知道罢？”她瞧见我默默不语，又说下去，“难道真的没人告诉你？对你，我用不着说假话，是不？老陈知道老李上江北，不能回来，他自己又分不开身子，才叫我上此地等你的。”

我再不能迟疑了。我带笑地重新站起来和她握手。她那铁一般有力的手，说明她真是能骑马，能打枪的那个佟桂英。

"桂英，得罪，得罪！"我向她道歉。

"你这人也太细心！要是不知道底细，我还不一脚把你踢出去？你吃饭了不？"她斜着身子坐在床上，不客气地说。

听了我说晚饭还不曾吃，她马上跳起来，一溜烟出去了。留在我眼里的是一个活泼健康的背影——不错，是佟桂英。

我默默在回想朋友给我的信，说：在××人的残酷屠杀下，乡村的女子也反抗起来了。最近十里堡有一位英勇的女子，叫佟桂英，领导着全堡的老百姓，劫了××兵的枪械，组织义勇军实行打××。真是满洲的马柳特加！记得那信的结语说："亡国的将军们听了这消息，不知道有何种的感想？"但是现在她怎会在哈尔滨？可不是日本人还出赏格捉她的吗？……

桂英回来了，带来大大的一块黑面包，一包干肠子，二瓶克哇斯。她一齐堆在桌子上。那房里唯一的桌子本来就小，何况已经摆满了一桌子的书籍、文具等等，现在再加上她买来的这许多东西，其乱七八糟可想而知了。

"吃呀！今儿请客，买了克哇斯。你喝克哇斯不？"也不等我的回答，她捻了一片黑面包往口里送，就是站在桌子旁边，倚着墙，那么的大吃特吃起来了。

她一面吃，一面警告我：这房子只许说说笑笑，不要说别的话。因为隔壁住的是一对日本夫妇，据说当家的在洋行办事。北方话说来比南方人还正确。她疑心他们"不是东

西”。她又说，在哈尔滨，每个院子里，尤其是象这寄宿舍性质的屋里，常常住下探子。人家不留心说错了话儿，就有人给你记住的。有时候，中国人时常给抄了家，或是逮了去，本人还不知犯的是甚么罪。哈尔滨还算好，××人还想摆摆“文明国”的样儿。要是在屯里，简直象对待台湾、高丽的亡国奴样的残酷。下江那边，井里放毒药，任意枪杀，强奸，甚或用大炮炸弹，把整个屯子毁成平地，那都是常有的事情。她的家就是在炮火中化为焦土的。……

隔壁的日本夫妇回来了，在房里哼着“大和歌”。那毛子姑娘在诵读故事给她妈妈听，声音就象百啭的黄莺儿。斜对门的女毛子，据说是暗娼，这时已经拉来了客人，在房里淫声荡语地笑闹着。

我们默默相对。月光惨白地洒在窗棂上。窗外的榉树在夜风中摇曳，低吟。远远地传来一阵话盒子的俄国民歌，那样慷慨激昂，令人联想起《狂人日记》中的“歌者”。

桂英好象不耐烦似的跳了起来，理一理蓬松的乱发，又坐下去，说：

“这时候我真想骑马。夜晚骑马，比白天有味儿。你想想，在满地是月光的大草原上，腿儿使劲的一挟，马儿就拼命地飞跑，飞跑，好象飞在半空样。再一转身，又跑进黑濛濛的树林里。勒住，马在喘气，夜猫子在号叫——啊，多乐啊！”她停住，在想象那情境，又忽然说，“郝先生你会骑马不？”

我摇头，笑说不会。她自傲地笑了笑：

“我不懂，为甚么不会骑马！”

“为甚么一定要会骑马呢？”

“不会骑马，好象没有腿儿，自己吃亏呀。我们屯里好几个老娘们都能骑，可惜胆子小，要不，我就多支臂膀。唉，真可惜！”她又慨叹似地道：“我们关外老百姓，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又糊里糊涂地亡了国，都是为了胆子小……”

我按住自己的嘴唇，警告她不要说下去。所以，连我想对她解说问题并不是因为胆子小的话，也只得咽向肚子里去。

暂时又静默着。外面又是歌声，又是笑语，又是淡白的月色。这一切，好象无情地在嘲笑我们这些被压迫，被损害的灵魂！

桂英似乎更加烦躁起来，恨恨地说：

“简直是在监狱里过活！我们的自由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在……”

还没有说完，而房门突然开了。走进来的是个十五六岁的中国学生，他低声而急促地说：

“老佟，你们还不快走，老李在江北发生了问题啦！”

这消息，是那么的突如其来，叫我和桂英都跳起来：

“老李？就是住在这里的老李？他有了问题？小范，这是那来的信儿？”

“刚才得来的，详细情形还弄不明白。老陈叫你们马上离开这房间，老佟住的那边也不能回去。”小范又面对佟桂英说：“老陈把新来的老郝交给你，你要代他想法找住

处。”

“半夜三更，那有法子！”桂英有些着急。

“谁知道！老陈说一定要你负责！”说着小范便想走，桂英叫住他，而他发急了：“得啦，得啦，我还有事，有话明天再说罢！”

碰地一声带上门，他走了。房里的桂英和我对瞧了一下，都在沉思着。我是人生路不熟，甚么法子也没有的，而桂英也象十分为难。

“这样晚，过江是万万不能，住栈房更别想，朋友家靠不住，有好儿家大概是同样情形，不能去，那怎办呢？怎办呢？”她自语着，又好象在和我商量办法。终于，她站起来，“这样罢，上马家沟瞧去。这里是不好住了。”

我们匆匆地上马家沟。而马家沟的儿家人家，不是打不开院子的大门进不去，就是给守门的恶狗赶了出来。结果，给我们失望。

大约已是夜里一点钟光景，实在是深夜的时候。我们仍是在街上奔走，找不到宿处。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依照桂英的意思，只有一法：我们除非扮作一对密会的情人，找块树林里的草地坐坐，挨过这讨厌的一夜。据她说，每当夏天，老毛子们时常在花影树阴里坐到天明。有些中国人也学上了，所以在哈尔滨，那已是常见的事儿。

“好罢，我们只有这样，不过你……”我也没有更好的法子。

“没有关系，这是必要的时候呀。”

于是，我们勉强放缓了脚步，手挽手地在月光中走着。我们算是“情人”了呀！

夜深的月色真象水般清凉。各处的景物都给月光净化了。黑巍巍的喇嘛台，尖顶耸得那样高，好象直伸到天际，想去挽住那渐渐移向西方的月亮，不让她无情地离开这梦般的人世。

南岗、秋林洋行门前的一行长凳上，疏疏落落地还点缀着一对对的情侣。路旁的矮篱笆下，萦绕着蜜语和笑声。软红色的窗纱间，有时映出舞兴沉酣的迷离的人影。

而我们，缓缓地走着，走着。我的心象压上一大块石头。要是有人走过，我们也热情似的相偎相倚，象在说甜话儿。走远了，我们依旧是抑郁，沉闷，而静默着。但是，我们可要紧紧的记住，我们要扮得象情人似地在散步才好啊！

末了，我们走进一座小树林。林中的草地，闪烁着破碎的月影。草际时时浮上微细的虫声，又象着惊似的忽然停止了。

“我到底是在田野长大的，听见虫声，就想起了老家。”桂英打破了岑寂说：“真怪，已经烧光的家，还是忘不了。瞧瞧这样的情景，我就有气！”

“那末，你家里的人呢？”

“我家里没有甚么人，爹早死啦。妈寄在吉林亲戚家。还有哥哥，在盘石那边当义勇军。月前听说受了伤，现在不知道是活是死——讨厌！别提这些罢！我不爱说家事！那不是我们说的！可不？”

她坐下去，不痛快地呼一口气。在阴影下，我注意到她的眼睛。那眼睛正象两颗星儿在闪光。突然地，她把眉头一锁，无目的地瞪住一颗树，突然地又紧闭上眼皮，又再睁开，往远远的林外望着。林外的月色象烟幕，密密地笼住这树林。

“就象这样的月夜，我们在拉林大屯子截获了××兵的枪械，是二月前的事了。”她慢吞吞地说，又笑了。“那一次才有味儿。我们，一个山洞穿过一个山洞，有老百姓带路。在洞口瞧见两个鬼子，我就是一枪，便倒了一个，第二枪，又是一个。鬼子真不中用，太禁不起子弹，一连人，一轰便散啦！我们追，追上一个打一个，就象打雀儿，好不痛快。青纱帐掩住了我们，××飞机没有劲，又是在夜里。前前后后共打死了十三个鬼子，剩下的都跑个光。我们夺得了十大车的东西。里头满是胰子、手巾、袜子，还有干粮。鬼子真不坏，打死他们人，他们还给我们送礼，可不？”

她轻轻地笑出声来了，又接道：

“天一亮，我们在大屯集合老百姓，分给他们六大车东西。他们乐意得了不得！有一个老头儿，头发胡须都白了，他还跳上一块老树头，颤巍巍地嚷道：你们瞧瞧，义勇军多好！你们现在还说是胡子，是胡子不？我早就告诉你们不是，你们不肯信。现在怎样儿？可不是领老百姓打××的义勇军？大伙儿都乐得大叫大喊：义勇军真好，义勇军真好呀！——不错，人心不死，中国人心不死！可不？”

“老百姓自然是好的。”

“对啦！只要我们拼命干下去，好的老百姓有的是。我

敢说，我死也不怕！”

“真个是勇敢的马柳特加！”我不禁赞叹着。

“说什么？马柳特加？”她好奇地追问着。“马柳特加到底是谁？老李也这样说我，我不明白，也没有闲心去问他，到底什么回事儿？”

我笑了，没有回答，她拿眼光追迫我，眼光是那末有力，好象不由你不说明。

“那是一个故事里的女主角：可是说她干吗，多无聊的！”我又停止了。

“无聊？那你为什么爱说？”她恨恨地道：“你们这班念书人，偷了典故骂人，也要对得住老天！”

“不，不是骂人的，更不是骂……”

“那你就该告诉我！”她抢着说，“这时候，说故事才合景呢！我作小孩时候，顶乐意听故事。”

她瞧见我还闭着嘴，便捉住我的手，使劲儿只一握，就象铁钳钳住般疼痛。她说：“告诉我不，要不，我挟断你的骨头！”

这样，我不得不告诉她马柳特加的故事。开头我是很简单地述说，但她不许，一定要从马柳特加在鱼村干活细细说起。她怎样地和官长定了不和男人养小孩的合约，怎样地拿枪头碰那些调戏她的人。她又怎样勇敢，打枪又准，瞄准时口里先数第三十，第三十一，在计算她打死的敌人的数目。她又怎样地打到第四十一个，只打中他的帽子，而变成她的俘虏，

桂英很有味地听着，注意着我，有时笑，有时赞叹地摇摇头。等到我说到马柳特加被派去带着那俘虏上总部去，坐的帆船给暴风飘到荒岛上，变做那俘虏的"礼拜五"，后来互相恋爱了，一直说到最后那悲剧的结果。这时候，桂英发出她反对的言论了：

"放屁！为甚爱上那俘虏？不能的！"

"因为人类彼此间，本来是没有仇恨。"我代那作者说明了原来的主旨。

"可是，为甚他们都给打死呢？有仇的总是有仇，怎会消灭呢？这明明是作者有意'扯鸡拔蛋！'我不信！爱上一个敌人，那真是比登天还难！我不信，那是没有的事！'扯鸡拔蛋！'"

"那做书的，本来思想就不大对，不过……"

桂英抢着道："那就是啦！那就是啦！"说着，她多情地笑了。

"那末，马柳特加可爱不，你也拿枪头打过人不？"我逗着她。

"我不！谁敢来碰我！"

离我们不远的，来了一对老毛子。他们走到一颗树后，坐下，紧紧的拥抱亲吻。

"噫！瞧瞧！那才是马柳特加和她的俘虏啦！"桂英好奇地指着那对老毛子这样说，而她自己的脸却羞红了！

月亮斜得低低的，映着草地上的露珠，象一幅无限大的银色珠纲。树杪卷来一阵寒风，林叶沙沙地响着。

"怕会下雨啦。"桂英好象怕冷，紧挤到我的身旁。她的眼睛变得那么温柔，迷梦似的。在静默里，我听到她急促的呼吸。

"真的，"她低声说，"我不爱男人，男人太坏，他会给你吃亏的。我没瞧见世上男人不是狠心的！真的，我不爱男人，我永不会爱上男人。我竟不爱听马柳特加会爱上那个俘虏！我的心是血的，又是铁的。可不是，要有铁的意志，铁的心肠，才能战胜敌人呀！你说，可不？"

但是，我感到她言外的一种忍不住的热情。真的，我的心也在跳着。可是理智告诉我，我无论如何不能和她恋爱。而且，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假扮情人的密会，为的是避免人家的注意呀！

但是桂英又动情地说：

"事情忙的时候，我不难过，我顶讨厌是闲着没事，自己老要胡思乱想！要是在屯里，我觉得难过的时候，我一定拉了马儿，往山林里跑个痛快。不过，也不能时常这样，怕××飞机望见。咳！真是杀不完的鬼子！"

她兴奋得好象要哭，但是她自已忍住了。

"真的，郝先生，"她又说话了。"我对你用不着说假话。真的，我有时候真闷！可是我该爱上男人吗？不，现在的时候，是国破家亡，我那能爱上人！我应该爱的是全体被压迫的人类，我应该爱的是向敌人战斗的一切同伴。呀，郝先生，我的心太大啦！实在太大啦！不过，这是对的，是好的！可不？"

“不错，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同伴。”我冷静地说。

“是呀，我们是同伴，我们应该相爱。不能只爱上一个人，只爱上一个同伴，我知道的。郝先生，我们不能只爱一个同伴，我们应该爱……”

一阵骤雨打断了她的话。——夏天时常是突然下大雨，不到一二点钟，又突然地晴了的，尤其是在哈尔滨。

雨愈下愈大。静夜的树林中的雨声，听来更觉奔腾澎湃，象发怒的海涛。林叶间漏下了又大又凉的水滴。周围尽是水滴的笨重的声响。整个树林都给一阵又湿又恼人的木叶气味所罩住。

这时候，我和桂英躲在一颗大榉树底下。桂英好象恐怕打湿了衣裳，紧紧的靠在我的怀里，突然她又象是胆怯地抱住了我。

在这夜雨的黑暗的林中，我们互相拥抱着，默然无语，在等待天亮。

第二天我们便分散了。

后来我才知道桂英是到哈尔滨办理事务的。过了一礼拜，她的事务清理好，就上东宁去了。我不久也就离开了哈尔滨。

自从那一夜之后，我们都没有机会见面过。也许往后永远不能有相见的日子了。

过　江

“是上马家船口？”

“马家船口这儿来！”

“上马家船口吗？这儿来，我的船马上就开。”

“我的不等人，就等你老！”

我才走下江边的渡头，立刻就给船夫们包围住，他们的喧闹声把我的耳朵都噪聋了。

好容易才冲出重围，跨上一只小划子，坐了下来。可是并不象船夫所说的一样，会马上开船——原来我做了这小划子的第一个乘客。

等着等着，总没有过江者。催船夫赶快解缆，已经催得他都不要听，连个回答也没有。

我坐在船上，船夫站在岸上，这样等了约有一顿饭的工夫，才来了第二个客人。是个趁呼海路车的。他比我更着急，催迫着船夫，带着愤怒。

“先生对不起，再等一个人便开船。”是船夫乞怜的口吻。

“再等一会儿，火车也开了！”是趁火车者的怒声。

“我打保，火车还没有到，我打……”

只管说话，来了的客人，已给别家的船夫抢去了。

于是，船夫又是任我们尽管催促，只是一声不响，睁大着眼睛，在等着抢夺客人，好象饿虎在等候它的目的物。

终于，他捉住了一个客人，带着胜利的神色，走上船来。他捉得那么紧，好象一放松，那客人会逃走了似的。

这客人是个小个子的青年，样儿怪斯文的，他的两眼象江水般碧澄澄，脸儿也怪娇嫩，好象经不起寒冷的江风，快给吹破了。可是他倒很慷慨，一口就答应了船夫的要求，多给了一个人的船费，好象他的事情比我们的更急。

于是小划子离开了渡头，摇摇摆摆地向对岸划去。

秋天的松花江可消瘦了，江水低落到深深的河床里，纡徐地流着，碧澄澄地映着天上雪白的行云，那么闲情逸致，不再象夏天大水时的急湍猛浪了。江面时见浅滩，还有一两处小沙洲，而且疏疏落落地长了一些水草。夕照懒洋洋地从水面爬到沙洲上，好象要把沙洲吞没到水里去。暮鸦寂寞地从天空落下来，又给小划子的桨声吓得连忙飞上去，一面呀呀地在叫着。江上的秋风，刮得水草沙沙地响。——这一切唤起我一种荒寂悲凉的情绪；虽然在江的上流，高高地站着中东路的铁桥；而下流，拉滨路的尚未完成的桥梁在涉着江水。

当小划子划进一条小叉港的时候，远远地望见两只巡查船，上面站有全武装的大兵，在检查船只：因为对岸便是黑龙江省的地界。据说，特别是呼海路车到的前前后后，巡查船总要泊在那儿巡检来往的客人，搜查逃饷或违禁的携带物。

在这时候，我们船上的那位青年人，好象有些忙乱了。他把随身的一个纸包，拿来坐在屁股下面，一下子又拿了出来）塞在船舱里，瞧瞧又是不妥，立刻拿来悄悄地扔在水里。可是，小划子已给巡船上的大兵拉住了。

这给我一吓，我以为这青年人一定要吃亏。

可是大兵跳过船来，东翻翻，西检检，又跳过巡船去，把手一扬说："走吧！"

"是这样检查呀！"我不觉失笑了。

"要是我这船上，有个日本人，怕连停船也不用停呢。"船夫好像在发牢骚。

可是，那青年人已若无其事地在微笑。他听了船夫的话，冷冷地瞟了一眼，又望望那向东流去的江水，好象对他扔下水去的东西，有无限的惋惜。

坐在我邻座的那个趁火车的，低声地，好意的问道：

"刚才扔掉了多少？那么一大包，怕损失不少吧？"

"没有多少。"

"要是时常这样，也不行，倒要想别的办法。"

"是是，"青年人漫应者。

"是自己的，还是替人家带的？"

微笑，没有回答。

"怕甚么？"那多嘴的客人又追问："你说呀，咱们都是中国人，怕甚么？"

"当然呀，都是中国人，我不怕！"

"对啦！"趁火车的得意地笑了。

但是我始终不明白他们在说甚么。我悄悄地问那趁火车的，他说，那年轻人是私带烟土的。

我重新把坐在我对面的青年人考察了一下，觉得他并不象个私贩子，在他的眉眼间有一团英伟不屈之气；他的脸色又是那样神光焕发，全不象个“老枪”，我不能不怀疑那趁火车的客人的话。

再从那包扔掉的东西看来，更觉得完全不对。那包东西，薄薄地，长长地，不象有很多的重量，扔在水里，也不会沉下去，只顺流地漂着，显然是一包纸类的东西，并非甚么烟土。

为要识破这疑团，我问：

“先生是住在哪儿？”

“道里。”

“可是念书？”

“是的，补习一点外国文。”

“不做买卖吧？”

“没有。”

“那末，扔掉的那包东西不是烟土了？”

“当然不是！”

“可是字纸？”

他呆了一下，非常注意地打量我。大概看出我不是个坏人，会意地大声说：“不错，是没用的废纸啊！”

好个“没用的废纸”！这废纸一定隐藏着一种力量，一种被压迫者的反抗的信号！……

我们再没有话说，只是相视一笑。这一笑，有说不出的亲密，好象我们一下子已结成好朋友了。

船靠岸时，我们还紧握握手才分别，怪多情似的，虽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的姓名。

真的，不知道姓名有甚么关系呢，站在同一战线上的精神，才是超越一切隔膜的挚情啊！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忘记这个有挚情的东北青年的面影。

佩　　佩

有几个××队里的朋友想和我见面，但因为环境的关系，不能到城里来看我，寄信要我到他们认为安全的一个屯里会晤，并且约我一早到城外的一座树林里等候带路的人，据信中说，那人是个认识我的女孩子。当时我一点也想不出是谁，我到满洲还不到一年，怎么有这样的女人认得我呢？但是我信托我的朋友们，决定如期赴约。

那一天早上，太阳初升的时候，我已在指定的杂木林中踱来踱去，踱了好久了。林里非常静寂，连一个虫声一个鸟声都没有，我等得有点不耐烦。而突然间，有一种急行的足音走近我这儿来，同时，我已看到一个白衣黑裙的高丽装的女子，在树隙间向我微笑。

“你不认得我吗？”

她站在我的面前，第一句便这样问。她是个体格健康，鼻子宽大的十五六岁的高丽姑娘。

“好象有点面善，可是我忘记了。”我呆站着。

“啊！小李先生，你真健忘啦，可是我永远不会忘了的。你的哥哥老李先生好吗？”

这一问，使我记起来了。那是在我刚到奉天的时候。那

时，想多了解一些社会的情况，我决定在沈阳逗留一个充分的时间，可是住的问题倒不易解决。住小店吧，化钱还在其次，最讨厌的是夜里的检查旅客。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旅客们时常会从梦里被拉了起来，非常不舒服，而且我也看不惯那些宪兵们的似笑非笑的嘴脸。租房子也很困难，要报户口，又要铺保，此外还有许多麻烦的手续。这使我十分为难。后来，却不过朋友的好意，只得搬到距离沈阳十多里地的老李家里去住。为要省却许多麻烦，冒认这个朋友做亲哥哥，而且改姓李。我的朋友是个铁路工厂的工人，人家都叫他老李，而我变成了小李。此后，老李就被公认为我的哥哥了……

"啊！我现在记起来了！"我叫道，"你就是我们隔屋的佩佩吗？"

"对啦！"她高兴地点点头。

"你可完全变了，北方话也说得进步了。"

"可是我还做不成中国人啊！"

我们都笑了，从林里的小径穿过去，密叶繁枝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可是白杨却发出唧唧的低语，榉树也在风中摇起头来了。她在前面走着，注意着碍路的刺棘丛。我默默地跟在后面一边在回想到半年前的往事。

那时，我既确定了姓氏，又认了哥哥，以为很可以在朋友家里安居下去了。但是，住不了两天，还是觉得不很安适，因为全院子里的人们都用怀疑的眼光在注意着我。老实说，我的确有点不伦不类，既不干活，又不上街，整天呆在

屋子里，况且又是个“蛮子”，耳朵和舌头都不大灵巧——总之，是值得人家怀疑的。不过这并非由于敌意，只是出乎人类的好奇心。所以一听到我的诳话，说我住到这里来是为了失业，人们也就释然了。大概住在同院子的人们都能容易谅解到一个人失了业，生活是很难合于常态的。

然而，我仍是未能安居下去，仍受同院子的人们的注意，这一趟还加上一些酸溜溜的轻蔑。起因是我结识了隔屋的高丽人家。

我住的院子很小，只平列着六间小屋，每屋一家，每家各以不同的方法在过活。除了头一家住着替房东管屋收税的管院人之外，他们都是穷人，卖菜的卖菜，赶马车的赶马车，而我的朋友老李，（不，应该说是哥哥老李，）算是一个殷实的门户，他每月在“大厂”可以领到三十几块钱的工资。其中最苦的要算那家高丽人，家里没有男当家的，只是母亲和女儿两口子，母亲已上年纪，工厂不要她，整天伏在家中打草绳子，而女儿的年纪又太轻，不能在这无情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一点生活的方法。

有一天晚上，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还不能睡觉，听见隔屋的母女吵得很利害，满屋都是啼哭声，母亲生气的打骂声，女儿的回答声，直闹到老李也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操他妈！”老李呢喃地骂道，“尽闹些甚么鸡巴玩儿！”

“那是我们的隔屋，”我说。

“是隔屋，隔屋的那个老娘儿真该死，整天迫女儿去卖

淫！可是那女儿有志气，老是不肯。现在，又在打她的女儿了，妈妈的！”

所谓伟大的母爱，已往那里去了呢？我自想着……

第二天早上，当我走出去倒水的时候，那个高丽女儿蓬松着头发坐在门槛上发呆，脸上仿佛还有一些泪痕。她的确有个很好的身体，胖胖地，就是褴褛的衣裙也掩不了她的青春的活力。也许觉到我在看她，她抬起头来胆怯地问：

“你也是中国人吗？”

“你为甚么这样问我？”

“整个院子的人都想问的啊！你不会说中国话。”

“不错，北方话我说的不好，我是中国的南方人。”

“那是真的吗？南方人也要学说中国话吗？那很好！”她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她又诚恳地说，“小李先生，我想求你帮帮忙。请你告诉我，怎么才可以做一个中国的南方人？我想学，我真想学！”

她想学做一个中国的南方人？为甚么？那不太奇怪了吗？我没有作声。

“我找活儿，”她解释道，“甚么地方都不要我，骂我‘高丽板子’，我到处受人家的气。要是我是个中国人，就不会这样受气了。可是我的中国话老是学不像，一开口就给人家看穿了，真倒霉，我想，我能做个南方人，象你这样，就行啦！”

她的话太异想天开了，使我怀疑她在和我开玩笑，但是看她说话时的又天真又诚恳的样儿，我知道她已是想尽了各

种方法在找活儿，我只说：

“做个中国人不一定能找到活儿吧？”

“能的，能的！”她确定地说。“在纱厂，烟厂，羊毛厂，统统是都只要中国娘儿们干活。”

这话也许是事实。自从“事变”以后，人们都集中到铁道和工厂的周围，象饥渴的鸦群，从荒芜的田地里，从被枪炮扰乱的山林中，从远方，从近处，都奔趋到城市里来了，带着生存的希望。于是，无论工厂或作坊，都有人满之患。而在这生存竞争剧烈化的时候，种族的歧视就有时会给利用出来了。可不是么，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的工资就大不相同，中国人每月最多只有三十多块钱，而日本人是一百多块，这是谁都明白的歧视。我不能不相信她的话。我决定帮助她。

我告诉老李，他也答应帮她的忙。

后来，她终于以中国的南方人的资格，在纱厂的粗纱间当一个女工。这使她乐得连中国话也说的更糊涂了！

“老李先生，小李先生，我不会说，不会说，我真不知道，怎样谢谢你老两位啊！”

此后，她时常要求我告诉她一些中国南方的情形，一心一意地想做一个南方姑娘。有时，听到我谈及南方的气候是怎样温和，山川是怎样柔媚的时候，她高兴极了。

“南方真不错啊，那是个好地方，比我们汉城还要好。我一定要到南方去一趟，”她说，“就是做个乞儿也是好的！”

她活泼地跳着，好象马上就到了南方了。她时常有一种青年人的勇气和幻想，而她的个性又是那么的倔强。她不会因为她的妈妈的打骂而让步，甚至当面骂她妈妈做老昏蛋。

这个活泼而倔强的她，就是现在引导我到屯里去的佩佩。佩佩也许不是她的名，只是因为她妈妈叫她，近似这声音，同院住的人们就这么叫开去，而我依着那声音写下这个连我自已也觉得太中国化了的“佩佩”两个字。

佩佩才隔半年，真的大大地变了。她现在不但变得更乐天，更活泼，思想也有进步了。当我问她：

“佩佩，你的老昏蛋怎样了？”

“甚么老昏蛋？”她停住脚步反问我。

“就是你的妈妈啊！”我笑了。

“哈哈，这趟算你的记性好，还叫她老昏蛋。我的妈妈死了，还是老昏蛋一样地死了。”她停了一下又叹气道，“我的妈妈也可怜，她只知道要活，可是一点也不知道怎样活下去。”

这时，我们已经穿出了杂木林，开始着赶路。展开在前面的是一片无边的田野，大豆和花生的碎叶，正绿得爱人，可是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已是荒芜了，好象远在“事变”前才有人来耕种，到现在，连那若隐若显的锄犁痕，都给杂草盖住了。一条黄泥的大路，笔直地穿过这个原野，要不是给远远的松林阻住，怕已经忘记了转弯呢。明媚的朝阳却跑在我们的后面，把长长的人影印在黄泥路上。我加紧足步追上佩佩，问道：

“那末，你就知道怎样生活下去吗？”

“当然啦！”她笑着说，“要是不，我现在怎会来给你带路呢！”

“啊，对了，我忘记问你，你是怎样来的，我走的时候，你不是还在纱厂吗？”

“是在纱厂啊。可是不久，就出了岔子了。”

“啊？”我追问她。

“我那时候不是冒认南方人吗？厂里的先生和班长，都相信我是的就要我。可是同车间的走狗，那个昏蛋，她缓缓地看出来了。有一天，她叫住我：‘你是高丽板子，我知道。’我吃了一吓，又带笑地声明说：‘嗳呀，大姊，你说话可要留心，别这样诬害了人啊！我是南方人呢。南方，在关里的中国的南方。’她冷笑，就跑去告诉班长，那个混蛋真是混蛋！……”

大概她生气时，就会骂人家混蛋的。老混蛋，小混蛋，真混蛋！那怪难听，我笑了。

“笑甚么，她是真混蛋啊！”也不理我更大声的笑，又接下去：“那末，班长和先生来叫我，他们审问我：‘你为甚么要说谎？是谁教你来的？可是红党教你来吗？’这把我问胡涂了，干活也要人家教才会懂得来吗？我说我自己来的。他们又问：‘那末红党呢，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甚么红党？’‘红党就是和我们作对，唆使你们闹乱子的坏东西。’他们这样和我解释，我只好答道：‘是的，知道了。’他们就生气：‘那你刚才怎么说不知道？’我急

了，我说：‘你先生告诉我，我就知道啦！’他们气得笑了，骂我‘妈妈的’，又告诉我，他们不用高丽人，叫我马上滚……”

“那末你就不干了？”

“不，我回车间里，哭起来了，姊姊们都围住我问干吗哭，我说了，她们都生气，走去责骂那混蛋走狗。那走狗真混蛋，和我们对骂，蛮不讲理，就给我们打个半死。可是事情就闹大了，厂里要带我和胖姊姊、三姊姊！我的妈妈死了，我就住在她们家里。她们都待我很好，象亲姊姊……”

前面尘土飞扬起来，好象一团黄雾，雾里闪出一驾铁轮马车，迎着我们驶来。那是空车子，只有一个庄稼人坐在上面，前额伏着一块又大又脏的厚纸，当作笠子遮住了太阳光，真是简朴得令人发笑。我们分开走，我让佩佩一个人走向前面去，不给路人看出我们是同行者，对我们发生一种无意义的注意。直等到走进那座松林里，我们才又攀谈起来。

那松林不很大，但都是一些古老的大松树，尤其是长在广漠的原野上，更显得象苍龙一样，每一棵都好象真要飞上天去。里面也不象南方的林子，有许多杂树和野花，在松根蟠踞的黄泥地上，只长着一些稀疏的青草，长长的，软软的，好象老妇人的头发。虽然在松林里，仍使我不会忘记我是在满洲，并非到了故乡。我的故乡的山地上，也有一座大松林……可是佩佩又继续她的说话了。

“我们得到要带我们的信儿，那是在夜里，大姊姊歇了夜班跑来告诉我们的。我们听了非常生气，几乎忘掉了害怕。

可是大姊姊警告我们，劝我们避--避。真的，他们完全不讲理，除非打死了他们，才有理可讲，我现在完全明白了。可是那时还糊涂，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好人，多少总有点公道，还希望他们饶恕我们。嗳呀，小李先生，那时真险啊，要是迟跑了一步，我们三个人现在怕已经死在监牢里了！我们逃走，我们在王家屯藏了好儿天，那是藏在胖姊姊的亲戚家。后来亲戚也怕起来了，我们又只好赶路。可是我们没有地方去，不知道上那儿好。胖姊姊的亲戚劝我们上关里，而我主张上南方，我告诉她们南方比甚么地方都好，我说了许多话，可是胖姊姊和三姊姊还把不定主意，我气得哭了，一定主张非上南方不可。那末她们两人答应了，我们就走上南方的路。可是我们都不认得路，胖姊姊又胖，走不到二十里路就走不动了，只好缓缓地走，又害怕他们追上，心里真是乱得糊里糊涂。可是一糊涂，就走岔了路。我们原是上朝阳城，可是我们朝东走，越走越背方向，错走上东边道了。那走得我们真苦啊！有一趟，我们找不到宿头，躲在树林里过夜。又有一趟在高粱地里，我们又疲倦又伤心，三个人抱在一起哭了老半天，一想到我们受苦的原由，我们又痛恨他们起来了。有一天，三姊姊和胖姊姊忽然在秘密地商量事情，不让我知道，我一定要她们告诉我，可是她们不肯说，后来我发脾气了，她们才说打算上间岛，听说间岛那边收留我们这样的人。谁都没有反对，那末我们就上间岛，此后我们就知道怎样活下去了。……”

“那末，你们就碰见我的朋友们？”我插着问。

“对啦，碰见了他们，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已有二个多月了。”

“可是，佩佩，你现在还想做南方人不？”

“不想了！”她笑着。“做甚么南方人，中国人，都是一样，胖姊姊她们可不是中国人，可不和这一样倒霉吗？不！不想做了，穷人总是一样的苦命，连日本穷人也是一样的。我真不做了！”

“那末，你还是做个道地的高丽板子好了。”我逗她。她盯我一眼，又笑了，干脆地说：

“高丽人也不做，横竖我是没有国家的。”

“那末，你就做着没有国界的女战士吧。”

“哈哈！”她大笑了，在笑声中可以听出她乐意这个名称：“一个没有国界的女战士”。可是她表示着：“女战士，算你会说。可是，我还不会打枪呢。”

我们已经出了松林。林外尽是一些丰饶的田野，水稻的嫩绿象云一样地在暖风中飘荡。田地里点缀着一些工作的人们，有的在锄草，有的在引水，还有的在阡陌间走着。只要看了这景色，我就知道距离我们的目的地不远了。……好了！好了！我望见那庄墙外的柳树梢，那可不是已在点头表示欢迎了吗？……

“我们到了。”佩佩掉过头来对我说。

裕　兴　馆

整个冬天，我都在马家沟的一家小饭馆吃饭。这饭馆，正位于一条偏僻的市街上。街上住的都是小工，车夫，和失业者。他们的屋子特别简陋，没有装饰，破旧肮脏，好象他们褴褛的衣服，那使这条街更显得荒凉，可怜得有如贫民窟。而那小饭馆，墙脚给雪堆掩没了，屋顶也积满着厚厚的雪，越看越觉低矮，好象只要用指头轻轻地推了一下，便会坍倒在地上的样子；要不是檐前垂下块脱了颜色的红布招牌，写着不歪不正的“裕兴馆”三个黑字，一个陌生的旅人，决不敢想到里面去解决饥饿问题的。

可是我知道这饭馆，不是因为那脱了颜色的招牌，也不是因那建筑物外表的古怪，引动我的好奇心；而是因为偶然从那街上走过，突然瞧见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古怪的屋子的木板门半开出来，好象鲸鱼微张着巨大的嘴巴，冒出一阵白濛濛的烟雾，在烟雾里飘荡着一个醉饱之后的得意的脸孔，和包裹在破棉袄里的臃肿的人身，他缓缓地飘出了烟雾的氛围，形成了一个身体高大的青年人，狗皮帽低压到他的浓眉上，蹒跚地踏着满街的厚雪，向我走过来，一步一幌地，好象已经烂醉了；他的又长又大的影子，斜映在雪地里，好象

一只黑色的大熊。

当我推开了这新发见的饭馆的门，耳边还听见那破棉袄的响着沉重的木鞋声，一面提高嗓子在唱：

——有孤王，

坐至在，

梅龙镇……

声音被关在门外，在寒冷的天空中颤抖着，越显出冬天的市街的静寂。

之后，我和那破棉袄的一样，变成裕兴馆的经常的顾客。

那是非常狭小的饭馆，里面只摆了四五只长的方的桌子；顾客坐近土灶的桌边，如果不小心，一定会把棉袄烧焦，或者给蒸笼里的热气喷得满脸水珠的。可是买卖并不坏，就是不在吃饭的时间，也还有人要了半斤白干和一碟咸白菜或黄豆芽，悄悄地独自浅斟低酌起来。这些人，大概是心灰意惰，饱受了社会的虐待和冷眼，除了酒精，再没有东西可以鼓励他们活下去的勇气了。

饭馆里很阴暗，在火烟和水蒸汽的迷濛里，飘荡着一盏五烛光的电灯，放出惨淡的黄光，每当屋里挤满了客人，充满了粗鲁的喧嚷声的时候，越显得黑影幢幢，好象一个强盗出没的秘密地窖。在蒸馒头的土灶的对面墙壁上，开了一个长方形的大窗，窗格上的玻璃，里面的擦得很干净，可是在屋外的那一面很脏，好象从这屋子造成的第一日起，一直就没有人来拂拭过，但觉尘垢密集，水痕斑驳，快要把玻璃原

有的透明作用掩没了。可是，坐在玻璃窗前的桌子旁，还可以看见屋外积雪的斜坡，以及斜坡下面的草棚，棚里住着夏天给大水卷出来的无家可归的难民。再远一点的荒原上，躺着死蛇般的铁道，到了黄昏的时候，就有一辆灯光闪烁的火车疾驰过去，频频响着刺耳的汽笛，好象在警告草棚里的难民，不要因为贫苦而忘记了吃晚饭。接着，从窗框糊着薄纸的破缝间，漏进来南岗喇嘛台隐约的晚祈的钟声。于是从一开一闭的木板门口吞进三三两两的劳动者及小贩，他们又疲乏又寒冷，饥渴使他们的性子更加暴厉，怒声喊着酒、菜、馒头或高粱米饭。

这时候，我已高踞桌旁，手里拿起第三个馒头了。而那个破棉袄的，比我更快，已经吃好了五碗高粱米饭，呆呆地坐在椅上，好象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正在打算晚上睡觉的地方。他的脸上锁着愁云，连眼睛也好象在云雾里的一般，蒙眬无光，这和我最初遇见时的醉酒的神态完全相反。看看别的桌子上正在喝酒的人们，满脸红光，有说有笑，我不禁可怜起他来，胸中感到一阵抑郁的闷气。

“大哥，这儿来，这儿有位子！”破棉袄的突然向个刚走进来，在人身的缝隙间找位子的铁路小工头喊着。

那小工头好象没有听见叫喊般向他坐的桌边走去。

“大哥，就坐在这儿吧，我已经吃好了！”破棉袄的站起来。一面必恭必敬地让坐。

小工头比他低矮一个头，阔肩，直背，满面胡子，有着一双慈祥的眼睛，神态高贵得好象一个绅士；要不是他象流

氓般把号衣随便披在肩上，和一举一动的粗鲁无礼，我几乎以为他是警察厅的长官，走到这肮脏的饭馆里来调查案件。他全然不理睬破棉袄的陪小心，旁若无人地坐下来，拿下披在身上的号衣，一掷便掷在桌子上。

“李头儿，才下来？”坐在对面的一个小叫卖招呼着。

他似笑非笑地点点头。

“这么晚？冬天还有那许多活儿？”

没有回答，小工头只直着脖叫：“堂倌！”

堂倌慌忙地跑过来，也不问一声，就背着已经背得烂熟的菜单：

“炒利脊，炒腰花，炒三鲜……”

要是人们照他背的菜单叫菜，我怀疑一定不会有。

这时候，破棉袄的挺直着魁梧的身子，呆站在小工头的背后，嗫嚅着嘴唇，可是听不见声音。直等到那小工头叫好了酒菜，回头瞧见了他的时候，他才低声下气地问：

“大哥，我拜托的事可——？”

这触怒了小工头，眼睛里的慈祥的光波立刻隐没了，闪着火般的怒气，大声叱道：

“你干吗还呆在这儿！”

破棉袄的如梦初醒，叹了口气，缓缓地移动他那高大的身子，出去了。

“傻瓜！”小工头瞥了一下他的背影，鄙弃道：“这么蠢的东西，谁稀罕！”一瞧见有人对他点头，也不管是否同意他的说话，便哈哈大笑起来，满满地喝了一大杯酒。

可是我真想狠狠地给他一拳！

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总瞧见那破棉袄的和小工头在表演这一幕没头没尾的滑稽剧，那时常激起我心中莫名的气愤。可是我和那破棉袄的没有说过话，就是有时被拼在一桌子上吃饭，谁也没有向谁开口过。这也许因为市街虽然荒僻，总算是都市的边缘，还不失一种都市的气味；都市人就是很不容易交谈的，甚至住在同一屋里，也不轻易寒暄一下，好象各自怀着鬼胎，怕各自的生活的秘密被发见。

然而我们终于说话了，那是破棉袄的先开口。

那一天，因为从朋友处借来一本中译的《高尔基选集》，顺路带进裕兴馆去，这引起那破棉袄的注意。他瞧我，又瞧书，然后呷了两口高粱米饭，夹了一片咸萝卜，往口里送，咀嚼着，于是又再瞧我，又再瞧书，又再呷饭——大概他在怀疑，怎么这下等的小饭馆，居然有懂得念书的顾客！

“这是你的书？”他终于问道。

“不，是借来的。”我答。

“借来念吗？”

“对了。”

“原来你是念书的！”他高兴得笑了。虽然穷困在无情地打磨他，他的眼角还留下青春的残迹；可是这残迹，一经留意就隐没了，好象在这个瘦削的脸上，羞于出现的样儿。

他十分客气地走过来，俯下身子瞧着书，呢喃着：“高——尔——基，高——尔——基。”

"这是那路的书？可是鬼子的？"他转向我这样问，好象长辈们在关心孩子的书籍。

"不，翻译的，作者是个毛子。"

"唔唔，"他放心地坐下来，在我的对面。我低下头只管吃饭，而他又呢喃着："高——尔——基，高——尔——基。"

我抬起头来，瞧见要说话又停止的嘴唇，便问他：

"怎么？"

"这——真对不起，请你告诉我，这高尔基是甚么？"他陪着笑脸，弯着身子，非常恭敬地。

"他是个很伟大的思想家，文艺家，是世界闻名的人物。"

在眼角的青春的残痕，又再显露了出来，我知道他感到兴趣，同时也被他的诚恳态度所感动，便简单地和他谈述高尔基的精神和身世。这伟大者苦斗的一生，给他多么的兴奋啊！他睁大眼睛，张开嘴唇，时或显出稚气的微笑，好象天真的小孩，听故事听得入神的样儿。

可是这一谈，饭都吃好了。接着我在等他和那个小工头的滑稽剧的演出。然而出我的意外，他只机械地站起来，也不向小工头让坐，就走出了。不过，小工头并没有放过他，仍旧傲慢地说：

"这么笨的东西……"

我不愿意听到他下面的刺耳的笑声，迅速地跳到门外去。当我在静悄悄的倾斜的街道上走着的时候，我发见后面

有人在跟我。高大的黑影，呆笨的足步，虽然在黯淡的街灯影里，我马上就知道是那个破棉袄的。我走着，他跟着，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使我疑心，又使我生气。我站住，叱道："干啥？"

他笔直着高大的身子，呆站着，嘴唇在嗫动，使我立刻联想到在饭馆和小工头表演的话剧，心中更加气愤，掉头不顾地急跑到电车站，才痛快地呼了一口气，想：这个真是太笨，傻头傻脑地！

在电车站的小屋里，钻出一个佝偻的老头儿，瞧见我是陌生的脸孔，就低下头去，失望似地叹口气，呢喃着："冷啊！冷啊！"

听见电车爬上斜坡来的一阵不断的铃声，那老头儿好象气力不胜地拖着一根铁条，蹒跚地走到电车上"把道叉"，无情的寒风震撼着老弱的身躯，好象非摔倒不可似的。他挣扎着，直等到电车无误地弯向西八乍市去的时候，才有气无力地拖着"把道叉"的铁条隐没到小屋里去。

电车轨在雪地里闪着透骨的寒光，朔风卷起地面的积雪，在呼啸，怒号，同时，卷起一声战颤的嘶破的叫卖声：

"拌子！拌子！"

第二天晚上，我走出饭馆的时候，他又跟在我的后面，当我走下南岗的斜坡，他仍然跟着，我走到电车站，他还是一道跟来。我狠狠地盯他一眼，可是他回我一个谦恭的微笑。于是我不得不站住了。

"怎么啦！"我大声地问。

"没有怎么。"

"你可是跟我的梢？"

"绝不，绝不，我怎敢！"他又卑微地向我鞠躬。

"那末，你可要借点钱？"他的褴褛的棉袄，使我不禁这样问。

"不，不，这是那来的话！我说，我说不怕你先生恼我，你先生学识很多，可是钱，不见得那末多吧。"又是一个谦卑的微笑。

"那末，你要什么呢？"

"这，太无礼，我可不敢开口。"

"别客气，说罢。"

"我想，我想借，想借那本高尔基，"他忽然变得很难为情似的，接着说："可是，我太大胆了！太大胆了！"

"不要紧，我借给你，只是译得不太好，有点难读。"

"谢谢，真感谢，我慢慢地读，不懂的就来请教。"

"怕你读不起兴趣。"

"读书顶有趣，我喜欢读书，可惜没有机会。我做小孩的时候，也念过几年书，可是没有办法再念下去，我家里穷，不得不找饭吃。可是还想读书，不读书好象不吃饭，一样会闹病……"

"你现在干什么？"我切断了他的谈锋。

"我吗？当马路小工，天冷了，没有活，有时替我叔叔'把道叉'，就在这电车道上。我叔叔老了，经不起冻。"

把道叉的老头儿佝着身子从小屋里走出来，一瞧见破棉

袄的便大声骂道：

“妈的巴子，可逛够了？你来干什么？这儿用不着你！怎么两天不见你的影子！”

“是，是。”破棉袄的呆立着。

我沿着电车道走下南岗，可是那破棉袄的突然叫起来。

“先生，等一下，”他一面叫，一面走到我的面前，亲热地说，“那本书，请你不要在饭馆拿给我，那里的人真可恶，会嘲笑我。”

“那末，就在这儿给你。”

“也不行，我叔叔瞧见也是要骂的，他说我失业，就是因为时常拿着书本子。”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我想起了裕兴馆后面的小树林，便约定在那儿相晤。可是，第二天在小树林下并没有遇见他。

以后在裕兴馆中也消失了他的影子，我暗暗的祝他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原载《红风灯》（海藻文艺丛刊第五辑），1939年8月20日出版。

关 外 杂 录

霜　　花

是大雪新晴的一天早晨，庭前的老树忽然换上一套白色的新装，好象春天到来了。

“可不是梅花开啦？”我说。

“真是南方人的口气，这时候那有梅花，那是霜花呢。”琳望着窗外，又笑道：“结了霜花，树枝儿好象披上一层轻纱。”

“可不是，比堆在枝头的雪要好看多啦。”

野外的树林才好看呢！那怕是梅花林，也没有开得那样均匀，那样玲珑的。

“我不信，我们瞧去。”

于是踏着路上的积雪，匆匆地下了南岗，走进铁路公园一带的树林里。我们迷失在一片的白茫茫的花雾之中，人在霜花丛下走着，好象闻到一阵阵奇妙的冷香。

“琳，谁说不是我故乡的梅林呢！”

我不禁大乐，而琳只微笑着。她小心地攀着小枝儿，好容易才折下一枝美丽的霜花。

“给你作纪念罢，”她悄悄地说。“将来回南方，见了梅花，不要忘记这霜花。”

可是霜花在她的手里融化了，消逝了。我接过来的只是一枝不折不扣的枯枝儿。

“霜花是这样容易消逝的啊！”

琳的心受伤了，眼睛噙着泪。

我把枯枝儿藏在衣袋里，安慰她道：

“虽然消逝了，可是我会永久地保存着。因为这是一种人生的赠奖。也许在将来的回忆里，是永远不会凋残，永远象未折时一样的美丽。”

原载1934年《人间世》1卷9号

在 海 上

才开冻的初春的海，在船头怒号。被碰碎了的浮冰，有时溅进船栏里。高高的船桅好象刺破低低的冻云，云隙漏出怕冷的疲倦的月亮。

在渤海的寒风中爬着的轮船的甲板上，到处瞧见那笨得象苦竹头样的，给破棉裤裹得紧紧的脚；旧的皮帽连着厚的棉衣的人体，蹲着，背倚着各人自己的小包袱。不能睡觉，只静悄悄地在抵抗透骨的寒风。我偶然伸一伸脖子，便瞧见对面的一双发光的眼睛。瞧不上三几趟，那眼睛微笑了发出闷沉沉的声音：

“你先生也是到东三省？”

“对了。今天的船多挤啊！”

“不，不挤！”他反对着。“事变以前人还多，成千成万的人都往关外，关外去！先生，关外是咱们吃饭的地方呀。”

“不是都回来了吗？”

“可不是。回来的是有，可少，去的更多。我时常说，大伙儿顾到口来便顾不得命了。”

我觉得这人有味儿，便和他谈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我是老百姓。我在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大黑滨都耽过。也到西安煤矿当过小工。日本人来了，什么都变了。活儿不易找。这儿也碰见找活的人，那儿也碰到找活的人，活儿倒没有了。那知道日本人也是穷的，想到东三省来发发财。这且不说，只说咱们中国人罢。饿肚子还不算，又要受日本人的气。

“那是在哈尔滨，有一天，我坐火车上顾乡屯，碰到日本兵检查，人家说满洲国的人，没有事，我说：中国人！就吃耳光！那日本鬼子还说：马鹿！你中国人马鹿！我回来想，让他们日本鬼子要杀便杀，要逮去就逮去，中国可不是完了？我还耽在这里干吗？当亡国奴，又找不到活儿，还不赶快回老家，老家那边才是咱们中国呢。那末我回家了。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到了家，也觉乐意。十几年没有信的老伴儿，还活着，笑嘻嘻地瞧着我。我问她：你这十几年是怎么过的？她说：糊里糊涂就过了啦。我想也对，一天过了又一天，可不

就活下去了吗？不过，往屋里瞧瞧，苦啦，半个盐萝卜也不知道要吃多久。都毛了呢！”

他过了一会说：

“待在家半年，瞧瞧不行，比十年前光景还难挨。地方又闹土匪，又闹水灾，种田是没有快乐日子的。自古道，乱世出凶年，可不错。吃苦的还是老百姓。我到处找活儿，那里有？大家是一伙一伙上码头，往外跑。我想想，待家可不是事。和老伴儿要了那只手钏儿，就悄悄地又跑出来了。我自己打算，还是上东三省罢，走熟路。如果日本人要怎样就让他怎样罢。现在的世路，可管不了许多了。你先生想想，要是有别的法子，谁乐意再上这东三省。这叫没法的事儿呀！”

“可不是！”我只有同意他的话。

“先生可知道，”他忽然凑到我耳朵上低声说，“咱们中国几时才打日本，听说不打呢，可是真的？咱们中国人到什么时候才有出头的日子呀？”

是什么时候呢？

我呆望船外的初春的海涛在黑夜挣扎着，呼号着。

原载1934年《人间世》1卷9号

万　泉　河

同样的地方，想象的要比亲历其境有味儿。我与万泉河，就是这样。

万泉河是沈垣消夏的一个好地方。有清浅的水流，低拂的柳丝，香喷喷的荷花；还有姑娘们的倩影；也还有小贩们在叫卖饽饽、香瓜、以及粉水似的冰糕。……

可是这一切我都不知道，我旅居沈阳的时候，只听见说，“九·一八”事变后，万泉河寂寞了一整年。直到开冻之后，柳芽儿放青的时候，方才有人去散步。他们好象太胆小，骇怕日本兵，又怕遭胡子，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了。不过，仍有一二个大胆的“沈阳诗人”，在报屁股上，发表他们绝俗的游兴，大加赞美万泉河的嫩柳，以及柳烟里的流莺。——其实他们不一定去欣赏过，做诗罢了。

接着夏天到来，万泉河又再热闹起来了。有日本马戏，有野台戏，还有卖艺团，唱落子班等等。卖茶卖汽水的也搭个布棚儿，有座位，而且铺着雪白的桌布。又是一番“太平景象”。

这也还是听人家说的。因为我虽然在沙阵与蝇群的袭击中，平安度过了沈阳的夏天，可是我没有去逛万泉河。并不是不想去，而是碰不巧。第一趟，还未曾跨出大门，天空已经布满了云阵，又是轰雷，又是闪电，好象马上会下倾盆大雨。这雨，结果给狂风席卷而去，而我的游兴可再也提不起来了。

第二趟呢，已经走到大南关，又给一位朋友拉住。他说：横竖是日本鬼子的世界，没有中国人的份儿，有什么逛的！况且刚才红袖头（伪满的军队）和日本人吵起来，日本兵偏袒日本查票员打红袖头，中国人一齐起来打不平，又给

日本马队弹压下去。事情怕会闹大起来啦。

这样的，我又只好不去了。

不多几天，事情果然闹大。就在那马戏场，演出弱者抗争的一幕。十二个日本人活活给红袖头打死。这事本不足为奇，日本兵下屯时常给种地的老百姓缴械，打死，没有一排人以上不敢上街。然而这一遭是发生在日本人自信能统制的红袖头，那有严密组织、甚至连排长都是日本的武装部队里，可见东北民众的愤怒是达到什么程度了。这一队人当然变成反日的一支力量。而这种情形，兵变，是时常见到的。

扯得太远了，说回来罢。这事情发生之后，万泉河马上布满了飞机，马队，还有暗探，在中国人中“工作”起来。游人因而绝迹。万泉河又沉寂下去了。只有那抗争的血痕，将永远留在万泉河的绿草上。

所以，一直到离开沈阳，我始终没有见到万泉河的美丽的夏天。

但是万泉河的冬天，我是瞧见过的。那是在浓冬，一个大风雪的薄暮。我那天是到兵工厂找一位朋友。因为他未曾下班，我冒着风雪沿一条小河瞎走着。那小河就是万泉河。全冻结了的河面，盖上约有半尺来深的积雪。如果没有那低低的长桥，横躺在雪地里，我以为是一片荒凉的平野。平野上立着几棵枯黑的老柳树，给寒风刮得在发抖，在悲鸣。有时，从瞧不见的村庄里，飞来三两声夜狗的狂吠。大风雪不顾一切的，任情狂舞，长啸。

这是我心眼中的万泉河，是抑郁而又带怒的。

现在夏天又快到了，江南已是这样的旎旖。不知道万泉河又是怎样呢。那抗争的血印还留在河边的绿草间吗？也许那血痕会变成不可抗的力量，战胜一切强暴者，将长留于东北的大草原上？

原载1934年《人间世》1卷10号

“亲爱的先生”

桌上只剩下黑面包屑和干肠子膜。大家点上耕种牌，小小的房里又充满了浓烟和谈话。

主人是一位补习俄文的穷学生，来客是工业大学念二年级的陈，下半期决意不再进学校的张，和我。这位姓张的绰号就是“亲爱的先生”。

我问起那绰号的由来，大家都笑了。姓张的红着脸说：“告诉你罢，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大家还未过冬节，我清早起来，瞧见窗上的玻璃已结了一层薄冰，冷得很，摸摸壁炉，也是冰凉的。我知道那老毛子太太昨晚又忘了烧柴。那东西一定是赴她的什么宴会去了。她这人也太岂有此理，在家吗，忙着喝酒，跟着曼多林唱歌，闹闹跳跳，也不知道从那来的许多野男女，整晚都不睡觉。不睡觉由她，可是又要我挨一夜晚的冻。

直到九点多钟才送早茶来。她穿上一件袖口宽到不能再宽的黑绸大红花睡衣，光着脚，敲敲门，就走进来了。

‘早上好，’她说，（当然她说俄国话，是我把它译下

来的，为了说着顺口），‘今天迟了，对不起，对不起。’

也许她真的觉得过意不去——你想想，既没有烧壁炉，又好几天不给我那房间擦地，桌布任它脏得青一块，黑一块，也不换换，而那一天的早茶又迟了二个钟头。她怕我不满意，想搬家。

其实不对，我何尝觉得坏到想搬家。只望她晚上记得烧壁炉，别的我不计较。

可是，她今天特别向我讨好，坐下来陪我喝茶，闲话，请我吸‘斯它意’，又异想天开地要教给我跳俄国土风舞，并且向我卖弄风情，说她没有当家的，不断叫我‘亲爱的先生’。结果她‘恳求’我把下月的房租先期给她。

‘就是此刻，’她说，‘要是你能就马上给罢，亲爱的先生。’

那时我听了，觉得又可笑又可气，想：

——好啦，又是‘亲爱的先生！’二个月前的“亲爱的先生”的味儿又来了！

二个月前我是住在另一毛子家里。房东是一位老奶奶。她的儿子在苏俄当兵，好几次写信来接她回去，要她去瞧瞧那边‘万事俱新的新社会’。可是她不信她儿子的话，她生气她儿子不听教训。她乐意一个子孤单单地待在哈尔滨，待在她自己用钱买来的屋子里，吃尽她的积蓄。近年来，积蓄快吃完了，她得出租她的‘三分之一的房子’。

对待我，正象一个严厉的母亲管教她儿子，她每天早上发令道：‘喝茶，来！’若是下雪天，她说：‘下雪呀，穿

大氅！’而那房子给她烧得那末热！夜晚呢，‘洗脚！’‘早些睡！’这些都是她的‘好意’，万万不能违逆。若违逆，她可唠叨到你‘坐又不安，立又不稳’的。那时节，你非得稍稍地蒙被躺下不可！总之，一切都要依她的意见。

不过，有例外。要是她教我买东西，譬如泡开水，买五分钱黑面包，两子儿沙糖，或者油盐酱醋，凡是一个小孩所能胜任的劳役都有我的。那时候，她一定很慈爱地尊称我一声‘亲爱的先生’。我在家只待着那末一个钟头，据我的计算，平均每十五分钟得做‘亲爱的先生’一趟。

慢着，请等等再笑吧，还有呢。记得是去年的夏天，另一个女房东，也是白毛子。她丈夫在沿东线的某小镇干活，我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活儿，要好几个月才回家一趟。她的家只有她自己，一个满周岁的小孩，一匹凶猛的看家狗，此外就是我了。她大概很穷，没有雇人。每天除上午上公园带孩子之外，剩下来的时间，这管孩子的责任，都是我的，只要我不上街。好象我并不是她的房客，而是小孩的保姆。可是，她又的确这样称呼我：‘请费神，亲爱的先生。’

得啦！这就是亲爱的先生的典故啦！不过，我还要声明一下，我待在哈尔滨还不够一年，共做了三种不同性质的‘亲爱的先生’，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只要我的能力做得到，我是做得又忠实，又尽职的。”

这姓张的说到这里，好象有点不平的味儿。

“那你又何必住毛子房子？”我追问着。

“你可不是想骂我自寻苦恼吗？也许不错。是自寻苦

恼。不过，只要你想到住中国人家的麻烦，讨厌，我又只有忍受了。那中国房子要铺保，房东比南岗的法院还要详细地审问你的年龄，籍贯，职业等等，这还在其次，最讨厌不过的是查户口，尤其是戒严的时候，跑进房里来的那一种奴才的奴才的威风，和日本人的那一副狡猾的嘴脸，才不好受啦！

与其忍受那威风，那嘴脸，我宁可暂时做做‘亲爱的先生！’可不是吗？”

“很对！亲爱的先生！很对！”那姓陈的大声玩笑着。我们几个人也就一笑而散。

原载1934年《人间世》1卷10号

买 国 旗

上元的兔灯，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这都是应时的玩意儿。

无意中走进某大商店，店里满插国旗，大大小小，敢有千万枝，如春花，如秋叶，满目鲜红，十分灿烂。我疑是错走进梦幻的山谷中。想一想，原来是双十节将届，这大概也是应时的佳品了。

可是我看到这佳品，国旗，却与兔灯，粽子，月饼之类的感觉大不相同，好象晤见故人，格外亲密。

也许在三年之前，这亲密的感觉不会有吧，但三年后的现在，“孤岛”情形大大地变了样。虽然每当国家的庆典佳日，也还可以悬旗庆祝，但一想起悬旗的许多辛苦艰难，令人悲愤填胸，不觉对于国旗，更加敬爱。

于是我买了一面小巧的国旗。

然而把来藏在家里，摆在案头，默然相对，但觉无味。

因此，我想寄赠一位朋友，使这格外亲密的感觉，更形象化，使这敬爱之情，象地下的潜流，流遍每个被压迫者的心。尤其是游击区中的朋友，如果接到我这面小巧的国旗，一定比我买这旗子时的心情复杂得多，也许在敬爱、亲密之

外，还感到那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奇趣。

这时，恰巧接到游击区的朋友的来信，于是，就把这面小旗子密封寄出去了。

原载《文艺新闻》第2号，1939年10月8日

关于“为了生活”

记得外国有这样一句格言：“食以养生，不是生而求食。”而这也是中国人认为一定不变的真理、可是自从社会变得畸形，上海又形成“孤岛”之后，这真理好象有点跟着动摇起来了。

据说人们干出十恶不赦的勾当，无论作奸犯科或认贼作父，都是“为了生活”。“为了生活”，已变成一面籐牌，刀来可以抵当刀，箭来可以隔住箭，是件了不起的武器，于是奸人大举挥舞起这籐牌来。

然而，还有更巧妙的，据说近来竟有人用“过桥”来威胁人家的事实。那是个知识分子，他走到他服务的地方去，说：“现在你再不给我钱，我就只好过桥去。”接着又说：“这不能责备我，我不只一个人，还有老婆，还有儿子，我不能眼睁睁看他们饿死的。”说得振振有词，似乎是无懈可劾，非给他一个满足不可。不幸的是：说后，对方竟不理他，而他竟真的实行“过桥”去了。那令人对他的“理由”，不得不加以考虑。

我们就事论事，对于那被胁者不以说服及其他的方法来挽救一个堕落下去的国民，固然不能不指出他的错误；可是

这“过桥者”的丑恶面目，更足以鄙弃。责难他，他自然又会高高抬起那面“为了生活”的籐牌了。

然而，这是真的么？我怀疑，我以为那不过是掩护“过桥”的烟幕。如果事前没有“线索”，即使“过桥”到达“彼岸”，也不过是“彼岸”的一个可怜的流浪者，不会有“真如”和“涅槃”的妙境的。如果事先没有吃斋念佛，“菩萨们”又怎会看中他而超度他呢？……

也罢，我们就退了十步，让他的“为了生活”成为理由；而事实并不是不“过桥”，就一定要饿死，成千成万的难民尚且能够艰苦地活下去，何况他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困难还不至于如难民之甚？也罢，我们再退让十步吧，认为他在上海真的已经走投无路，可是，我们会很自然地问，为什么不到内地去，偏要“过桥”。不错，过桥比到内地去的路要近得多，便当得多，可是也就该死得多！

俗语说：“时势造英雄”，但英雄也能造时势，这是辩证的发展。一个人的为善为恶，也不全是环境使然，这中间还有自己决定的余地。为正义而牺牲的人，全凭他自己对于正义认识的彻底，并没有人强迫他；而为生活而堕落下去的人们，全因为他自己意志薄弱，也是没有人迫害他的。所以《明末遗恨》中的郑芝龙、李如蘅之徒，不得不用小花脸来演出了。

现在的生活，的确一天比一天困难，作恶的诱惑因而更大得多；可是意志坚定，即使苦一点，也不至于着迷的。同时，我们还须知道，这不是绝望的偷生，这是卧薪尝胆！

而且，我们也不必对着乱舞的籐牌而感到苦恼，因为那籐牌虽能逃避了刀和箭，可逃不了正义的子弹。

原载《文艺新闻》第6号，1939年12月10日

说 苦 衷

俗话说：千人千般苦，没人苦相同，所以人各有各的苦衷；可是这苦衷，时常会造成人生的许多不必要的悲剧。作奸犯科者有作奸犯科的苦衷，腆颜事仇者有腆颜事仇的苦衷，而且说得泪光融融，眉头皱皱，于是乎那班昏庸的人道主义者，就毫无条件地给予无限廉价的同情；因而苦衷有了论据，理由更加充足，而声音也就说得更响亮起来——其实那已不只是替自己辩护，而在影响人家，说服人家了。

可是那些既不能作奸犯科，又不一定有勇气腆颜事仇，而又明知故犯者，其头脑真是胡涂得惊人，而其苦衷也一定更苦，好贪小利，又怕得罪人家，到处逢迎，而不一定处处讨好，只是嗫嗫嚅嚅，趦趦趄趄，真是有“苦”也“衷”不出；但从客观看来，那虽非主犯，也同帮凶，有时难免发生了生命的危险，求苟安反而得到横祸。然而血虽流而很难博得人家的同情，身虽死而徒增世间的遗憾，总之，只落得死有余辜，生无可恕的罪名，这才真是不必要的人生悲剧。

顷阅报载，关于中社的血染，记述颇详，因主演者是个“新贵”，造成血案自有其社会的原因，所谓事有必然，理有必至者，故对于血案本身，无容论议。所可惜的是：那些

受伤或杀死的贺客们，尤其是那两个年轻的女傧相，真是横祸飞来，连做梦也不曾梦见过。也许他们或她们不是附庸，也不想帮凶，各有各的苦衷吧？可是细按之，也还是“余辜”之类。

人之处世立身，自有其道。行险侥幸，固然不可，委曲求全，也是有害，至于见利忘义，附庸“新贵”，更是人所共知的罪恶。如果说，这也是苦衷，那末这“苦”就赛过黄连，也难给予同情之“衷”了。

所以做人不可胡涂，要有理性，有标准。别以为世界既已如此胡涂，作奸者可以名利双收，自己也就胡涂起来，可是这一胡涂，就要连生命都要胡涂掉的。中社的贺客及女傧相们的遭殃，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古人已经明瞭这道理，而且有人心者时常苦口婆心，耳提面命了，只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所以直至现在，仍然有同样不必要的悲剧发生。

昔者，管宁的割席，钱谦益的老朋友拒见钱谦益，其做人的不胡涂，有理性，有标准，是千古传为美谈的，而且象这类的例子，真是多到举不胜举。就是今天，明大义者也不在少数；然而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舍正路而不由，而还要皱着眉头，诉说苦衷，叫人原谅，这正如古语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对于这样的苦衷，不但不应原谅，而且必须给以无情的驳斥，故有是说。

原载《文艺新闻》第4号，1939年10月26日

编 后 记

饶芃子 黄仲文

戴平万的短篇小说集《苦菜》重版了，我们为此感到由衷地欣喜。《苦菜》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至今已整整四十一个年头了，由于“孤岛”时期出版的书籍，印数都不多，加上战争年月的散佚，目前全国只有少数几个图书馆藏有这本书，广大读者已无法读到。现在把《苦菜》编入抗战丛书第四辑重新出版，让它和今天的广大读者见面，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苦菜》的重版告诉我们，戴平万和他的作品是一种历史存在，同志们在回顾以往的斗争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他，历史没有辜负每一个对它作过贡献的人，也许可以告慰作者于九泉吧！

戴平万原名戴均，一九〇三年诞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归湖乡溪口村。戴均是他在小学和中学念书时的学名，上大学时，才改名戴平万。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各文艺刊物上发表作品、文章、常署名平万、戴平万或戴万叶，也用庄错的笔名发表散文。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他经常用岳昭、君博的笔名在“孤岛”的进步刊物上发表论文、译作和文艺短论。

戴平万出身于一世代书香的封建家庭。曾祖父是清朝举人，祖父是潮安县有名的布衣文人，父亲戴仙俦是清朝末科秀才，能诗、能词、又擅长书法。由于家庭的影响，戴平万从小就酷爱读书，是一个文学气质很重的人。他八岁进家乡私塾念书，三年后到县城进学堂，一九一八年考进广东省立潮州中学（后改为金山中学）。在中学学习期间，他不但喜欢写诗、填词，对民族音乐也有浓厚的兴趣。戴平万在潮州中学后期，正值"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文艺书刊，参加爱国宣传活动，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接受新思想的洗礼，为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下了思想基础。

一九二二年秋天，戴平万考取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西语系。进大学以后，他醉心于文学研究，研读了中外的许多文学名著，也注意阅读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作品，郁达夫的处女作《沉沦》，曾经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五四"运动，他对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已经有所认识，但是却又未找到自己的出路，他渴望着冲出旧中国的精神牢笼。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革命高潮中，他投身于革命学生运动，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走上革命的征途，先参加国民党左派组织，随即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以后，他目睹帝国主义制造的"六·二三"沙基大惨案，亲身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深切感到中国人民要解放，就必须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从而更坚定地走上了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道路。

一九二六年，戴平万大学毕业以后，被党派到暹罗开展工作。后来因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屠杀海内外革命人士，他被特务跟踪盯梢，几经周折才脱离险境，回到上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出路》所收的六篇作品，大部分就是这个时候创作的。

一九二七年秋天，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率领“八·一”南昌起义的红军进驻潮汕，戴平万在上海得知这一消息，马上乘船回潮汕，准备参加武装斗争。船到中途，才知道因形势急骤变化，红军已撤离潮汕。他回到潮汕后，在一个村子里匿居了一个多月，便乘船到了海陆丰农民革命根据地，参加农民运动。后来海陆丰农民起义失败，他又经香港回到上海。戴平万在海陆丰农民革命根据地的时间不长，但是火热的斗争生活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他回上海后在各文艺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反映农民运动的作品，大多是取材于海陆丰农民的生活和斗争。

一九二八年以后，戴平万一直在上海从事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左联”成立之前，他是“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和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杜国庠（林伯修）、洪灵菲等一起出版《太阳月刊》，创办《我们月刊》，并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有关“左联”的筹备工作。“左联”成立以后，他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是“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的撰稿人之一。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他先后在《太阳月刊》、《我们月刊》、《新流月报》、《拓荒者》、《海风周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小说和译作，还撰写介绍外

国革命作家的论文，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中篇小说《前夜》和《荔清》。钱杏邨（阿英）在一九三〇年写的《关于〈都市之夜〉及其它》一文中，充分肯定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称它们为“新兴文学的花蕊”。他的短篇小说《陆阿六》，还作为“左联”时期的优秀作品译成日文介绍到日本去。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有一段时间他被党派往满洲开展抗日工作，创作较少，但也出版有译作《求真者》（辛克莱著），理论著作《俄罗斯的文学》，并写了不少反映东北人民生活和斗争的短篇小说、散文和随笔。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留在上海“孤岛”坚持斗争，是“孤岛”文学界党的负责人之一。在“孤岛”，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既从事《新中国文艺丛刊》和《文艺新闻》的编辑工作，还负责《每日译报》的本埠消息版，此外，他和王任叔、林淡秋等同志一起，参加文艺通讯员运动的组织发动工作，和梅益、林淡秋、钱堃等同志一起编辑《上海一日》一书，支持《戏剧与文学》、《文艺》、《文艺长城》等进步文艺刊物，为它们撰稿。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的论文和文艺短论，有时也翻译外国通讯社有进步意义的文章，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苦菜》。他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大都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旨在帮助读者在复杂的环境中识别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引导人们为正义的事业而斗争。

一九四〇年冬，戴平万从上海到苏北根据地，主要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和教育工作。一九四五年初在根据地去世，终年四十二岁。由于戴平万去世较早，而且解放前的左翼文艺

运动，是在白色恐怖下进行的，革命刊物动辄被查禁销毁，他的作品散佚比较严重，一般人难以读到，所以他虽然是一位在“左联”和“孤岛”时期有过一定影响的作家，但是对于今天广大的读者来说却是陌生的。《苦菜》的重版将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位作家的一般情况，我们也就不惮在这里对作者的生平和《苦菜》这一集子多说几句。

《苦菜》是戴平万在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共收《苦菜》、《病》、《在风雪中》、《哈尔滨的一夜》、《过江》、《佩佩》等六篇作品。这些作品都取材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东北同胞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悲惨遭遇，和他们的反抗斗争。一方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一方面歌颂了东北人民反对压迫的斗争精神，无论在思想深度上和艺术造诣上都标志着作者在创作道路上迈开了新的一步，是很值得称道的。

《苦菜》通过纯朴、善良的李老太到松林里采摘苦菜，被日本兵无辜枪杀的故事，反映东北同胞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下的痛苦生活。李老太一家靠种大豆为生，由于日寇入侵，大豆无价，虽是收成不错，一家子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不得不外出采摘野生的苦菜。可是正当她在松林中采摘苦菜的时候，却遇到了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哨兵。李老太受尽凌辱，令人不忍卒睹，最后被这些强盗残酷地枪杀了。作品不仅写了李老太个人的不幸遭遇，而且还通过李老太从家里到松林一路上的所见，展现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农村一片凄凉的景象，到处是给炮火烧毁的房屋，没有人烟的村

庄。这些和李老太的悲惨遭遇联系起来，从而十分深广地揭露和控诉了日本鬼子在我国领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人们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这篇作品在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真实而细腻。自然景物和环境的描绘，具体、逼真而且富有寓意，对于深化作品的主题和人物的性格，都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与《苦菜》相类似，《病》则是通过青年工人小李贫病交迫，走投无路的不幸遭遇，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小李原是铁工场的青年工人，因为得了寒热病，不能上班，自然没有收入，生活无着。再加上日本鬼子入侵以后，东北一带工业萧条，工厂倒闭，到处在撵人，他的朋友都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对他爱莫能助，他只好咬紧牙关重利借钱治病，企望把病治好，还能将日子捱下去。但没有料到铁工场在他生病期间已经停工了。结果是：工场拒绝他，贫困围攻他，寒热病袭击他，“他的孤苦的人生前途完全陷落在无垠的黑暗里”。这就是东北人民一时难以治好的“人生真病”，也是侵略者带来的深重灾难。

集子中的其他一些作品，则在揭露侵略者罪行的同时，着力表现了东北同胞反抗侵略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风雪中》写一支十一人的游击分队，由于和总队联络的路给敌人切断了，不得不下屯，可是农民开始不了解他们，不敢接近他们，加上队伍内部有人动摇，有人违反军纪，抢了群众的粮食，农民们把他们当强盗，他们面临着“国破家亡，无处偷生的现实环境”。后来，他们用自己的行动——

惩罚抢粮者，让他向老百姓承认错误，又把袭击鬼子兵得来的战利品分给贫苦农民，终于得到屯里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在群众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的战斗。在作品中，作者集中笔力刻划了一个正直、勇敢，具有坚忍不拔精神的年轻游击队员小西子的形象。他原是纱厂里的一个小工，工厂停工以后，投奔游击队。他虽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但有头脑，有主见，识大体，顾大局，当游击队的负责人在困难面前动摇要离队，小分队面临解体的时候，是他团结了分队的同志，耐心做群众的说服工作，抓住有利的战机袭击鬼子，终于战胜困难，渡过难关，把游击分队整顿成为一支新的战斗集体，迈开新的战斗步伐，他也在斗争中成长为游击分队的领导者。此外，作者还刻划了一个大兵出身的游击队员董国标，写他如何在斗争中不断受到教育，去掉旧习气，逐步成长起来。作品通过这支小小的游击分队内部和外部的斗争，反映了东北同胞在十分艰苦的环境里，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的不屈意志，表现了一代新人在斗争中的成长。这是一篇思想上艺术上都有相当深度的作品。

《哈尔滨的一夜》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写法，写“我”刚到哈尔滨就遇到战友出事，无处安身，由女义勇军佟桂英带领在街道浓荫下隐蔽的一夜。作品的女主人公佟桂英是当时抗日义勇军的女英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鬼子烧毁了她的家乡，国恨家仇，她再也不能容忍敌人的猖狂，带领乡民奋起反抗，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她能骑马，会开枪，勇敢善战，是战场上的一位勇猛的战士。但作品描写的不是

战场上的佟桂英，而是在白色恐怖下，她掩护自己的同志时，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感情；她的洁净的灵魂，不愿受压迫、被蹂躏的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赤忱的心。而这一切又是以一个青年女子特有的性格和方式表现出来，显得那么纯真，那么坚定，同时又夹杂着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这是一个真实、可信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品在热情地歌颂象佟桂英那样有铁的意志、敢于反抗压迫的抗日英雄的同时，还通过“我”在哈尔滨一夜的所见、所闻，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哈尔滨和东北广大农村所制造的血腥罪行：诸如在井里放毒，任意枪杀、强奸，用大炮把一个个村庄夷为平地等等。《哈尔滨的一夜》情节并不复杂，但作者写得细腻而曲折有致，并且寓爱国精神、民族意识于动人的故事之中，景物描写相当精彩，落笔处既有画面，又富诗情，创造了诗一样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过江》是集子中篇幅最短的一篇，写的是“我”在过江时见到一位东北爱国青年，在日本鬼子巡查时把一束纸卷机智地沉入江中的故事。事情是极其平凡的，但作者依靠自己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经验，他的政治敏感，从平凡的日常事件中发掘了它的不平凡的意义，歌颂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佩佩》在结集以前，曾以《满洲琐记》为题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光明》半月刊创刊号，写“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日寇的蹂躏，农村破产，工业萧条，生存竞争激化，各工厂作坊出现了用人上的种族歧视。作品的女主人公佩佩是

一位朝鲜女孩子，家里十分贫困，虽然她能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可是因为她是朝鲜人，所有工厂都不收用她。她只好冒认是中国的南方人，在纱厂的粗纱间当一个女工，后来被发觉而开除了。她这种不幸的遭遇，引起了一些女工的同情，起来反抗厂方，以致遭到警察的追捕。她们走投无路，最后投奔抗日游击队。在游击队里，她们懂得了怎样生活下去的道理，佩佩也成长为“一个没有国界的女战士”。作品塑造了一个活泼、乐天、有志气、性格倔强，追求光明的朝鲜女青年的动人形象，通过她的不幸遭遇和生活道路，展示出劳动人民在日寇铁蹄下无以求生的痛苦境况，同时也表现了广大人民追求合理的生活和光明的前途的顽强意志。

《苦菜》篇幅不长，字数不足十万，但它却是一束饱含着革命激情的精致的艺术之花。它凝结着作者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对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自由的渴望和信心。作品中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和人民大众，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关系。在作品中那些善良而朴实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纯真和庄严的感情，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苦菜》出版时，戴平万才三十八岁，这是他的第八本集子，也是最后的一本。如果他不是在正当有为的壮年的时候过早地去世了，以他的真诚和才华，相信一定会为祖国、为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愿《苦菜》常青！

让《苦菜》的精神永存！

1982年11月30日

作品介绍 本书收入戴平万在上海“孤岛”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及散文，共14篇。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作者在作品中通过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蹂躏东北同胞的种种罪行；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寇统治下的痛苦、挣扎和反抗；热情歌颂战斗在抗日最前线的义勇军和游击队，以及许许多多在自己岗位上坚持抗日的爱国同胞。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坚贞而崇高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斗争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艺术上构思缜密，刻画细腻，语言朴实而委婉。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戴平万



苦菜

责任编辑：管　权

封面设计：卢　清

ISBN 7—80534—075—7

I·69　　定价：2.05元